

蕭揚 著

三年來英美蘇遠東政策的透視

遠東書店發行



0801
2



3 1798 0507 6

三年來英美蘇遠東政策的透視

蕭揚著



遠東書店出版

1940, 7

前記

三年以來，國內某一部分人的宣傳和輿論，憑藉了他們對民衆言論與出版的統制，業已相當美滿地完成了他們的任務。——他們已把中國的民衆領入了迷途。英國名記者阿特麗在她的揚子前線中，會把她親身經歷的事實，這樣告訴我們：

「我和這些四川兵談了一陣，聽着他們說到『像英美等強國都在援助中國，中國怎麼會不勝呢？』的時候，真是令人黯然感傷。其他的士兵還有着同樣的誤信，說蘇聯正在協同中國作戰。政治工作人員的工作，是進行得非常美滿了，但是欺騙這些腦筋簡單的農民，是公正的嗎？」

最近，我又在報上看見重慶一個士兵，因為同情和欽仰英國的「反侵略的抗戰」，特地從他每月四元五角的餉銀中，拿出一元來送給英國的駐華大使，作為救濟英國傷

兵的基金。三年以來，我們的士兵與民衆，在這種宣傳政策薰陶之下，不免有一部份人，也貿然地跟着親帝的老爺們盲航於帝國主義的絕路中。這實在是很可痛心的事。

這種宣傳政策之被採用，甚至一直採用了三個整年，當然不是意外的或偶然的事。情。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戰爭，主要是倚賴自國有組織的革命民衆，如果不願意動員民衆，就只好把希望寄託在外援上了。三年以來，國內的上層份子，始終把目光集中於倫敦或華盛頓，這種親帝的傾向，就是上述的宣傳政策的根源。他們的主要目的，是掩飾歐美帝國主義國家的真面目，誇張英、美、法與日本的矛盾，強調他們對華援助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從而使他們親帝的和鎮壓民運的倒退政策，獲得合法的論據。近年來他們的主張甚至發展到完全忘却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忘却他們曾經粗着頸子直喊的「自力更生」的口號，而熱烈地誠摯地期望美帝國主義者出來領導中國的抗戰！

然而打擊他們這一政策的，主要的不是中國民衆的輿論（在階級的言論統制之下，中國民衆還沒有充分足以發表其政見的機會），而是英、美、法等帝國主義國家殘害

和出賣中國民族利益的自私行為，帝國主義國家一向毫不吝惜「同情」與「保證」，同樣，也毫不躊躇地宣揚他們的政策的「決不改變」，這些一點也不足驚奇，可驚的是國內那些權威的宣傳家們，却拿這些不值錢的「同情」，不兌現的「保證」，和早已改變了的「決不改變」的政策，來蒙蔽民衆們。於是我們看不見批評，只聽見捧場的肉麻的喝采。中國的輿論界成了一片沙漠，在若干小區域內出現的民衆的政見，傾成了珍貴的青草和花朵。

民衆永遠不會懼怕真理，他們是永遠探求和尊重真理的。當權威的大人們的宣傳，被事實攻擊得體無完膚的時候，民衆的意見，却有如久經磨琢的金玉，愈益晶亮而富於光彩。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是抗戰三年來的重大收穫之一。因為中國的民衆們，現在至少已可以望過當前的荆棘，看到光明的前途，而判清他們的友敵了。

愛國的民衆一向主張抗戰的外交政策，應該是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然而獨立自主的外交，只有憑藉革命羣衆的力量，也即憑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能利用帝國主義

的矛盾，以削弱敵人，增強自己的力量與地位。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外交，與一九一九年前後蘇聯的對外政策，就是一個最好的榜樣。愛國的民衆一向又明白指出：抗戰的勝利，不僅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至鴨綠江外，而且是一切帝國主義加之於中國的半殖民地枷鎖的擺脫。因此在外交政策方面，只有革命的外交與聯蘇的政策，才能使中國達到此一目的。聯帝的政策，將使中國永遠陷於半殖民地的悲慘命運。就後一政策而論，我們不能利用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矛盾，以取得他們的援助，相反，我們將被他們利用，而作為他們與日本討價還價的本錢。聯日與聯英、聯美，在我們看來，並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至多只是使一個主人的中國變為幾個主人的中國而已。

本書的目的，就是忠實地說明英美蘇二國二年來的遠東政策。也許有人要說，筆者的態度未免太殘酷，說不定會減弱民衆的抗戰決心；但我的意見，却與這相反。出版界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是如何把真實告訴民衆，免得他們臨急倉惶。我們不應該只讓民衆看到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牠畢竟跟英國有着某種差異）對華的有限援助，我們

更應該叫他們明白英美傷害或出賣中國的行爲。中國的民衆決不會因看清了英美的真實態度而沮喪，相反，當他們曉得除開蘇聯和各國的人民大眾的援助之外，一切的外援都是不可靠的時候，他們將格外奮發，格外自信而勇猛直前。

這本小書是在倉卒間寫成的，從搜集材料到完稿，前後只經過兩週的功夫，關於這些問題，我本是一個外行人，而這種草率的態度，更使我感到極大的愧慙。其中特別是第一章，實際上只是材料的堆積，決不能稱爲文章。本想重寫一遍，但「七七」三周年紀念日前後上海形勢的緊張，使我只好草草加以結束，好在作者原來只想提供一點事實，我相信任何一個清醒的讀者，都可以從這些材料中求得他們的結論的。如果能因此而引起出版界對這些問題的檢討，那更是意外的收穫了。

一九四〇，七，十日蕭揚記。

目錄

前記

第一章 三年來英國的遠東政策……………一

引言……………一

一 戰爭初期的不干涉政策……………六

二 國聯和不魯捨拉會議……………一四

三 海關協定……………一六

四 誰資助了日本……………二一

五 東方的慕尼黑路線……………二九

六 歐戰後英國的遠東政策……………四二

七 中國對英政策的批評……………五六

第二章 三年來美國的遠東政策……………七二

一 美國遠東政策的矛盾傾向……………七二

二 從經濟上觀察美國的遠東政策……………七六

三 從政治上觀察美國的遠東政策……………九六

四 中國對美政策的批評……………一九

第三章 三年來蘇聯的遠東政策……………二八

一 蘇聯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二八

二 三年來蘇聯對日的政策……………三五

三 三年來蘇聯對華的政策……………五六

四 中國對蘇政策的批評……………六八

第一章 三年來英國的遠東政策

引言

恰恰在一百年前，英國最先代表了西歐的資本主義世界，打開了深閉三千年的中國門戶，自此之後，中國就一直陷於半殖民地的地位。牠靠着海軍的威力，特別是使英國三島成爲『全世界工場』的工業，及其廉價的貨物，在遠東——跟在世界其他各處一樣——獲得了煊赫的霸權。近百年來，牠施之於中國的金融干涉與政治控制，竟是這樣深入和牢固，以致自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歷史，簡直沒有一部份不與不列顛帝國主義發生密切的關係。

自從資本主義過度到牠的最後階段——帝國主義之後，英國才漸漸失去牠在中

國等世界市場上的獨佔地位。由於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律，比較年輕的資本主義國家，漸漸追上了或追過了老的資本主義國家。在這些比較年輕的敵手（如美德等國）壓迫之下，英國不得不一個接一個地退出牠原有的障地。帝國主義矛盾的尖銳化，和軍備的競爭，使大不列顛帝國的威力相當削弱，絕對優勢的海軍噸位比率，牠已無法維持。這威力的削弱，最初就表現在遠東，當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行將爆發的時候，牠盡爭把遠東所有的海軍力量，調到歐洲的海洋上去。

帝國主義時代這種勢力的變動，使英國的外交政策也起了重要的變化，牠已從「光輝的孤立」政策，過度到結交軍事政治同盟國的政策。從一九〇二年到一九二二年二十年間，英國始終藉着英日同盟來鞏固牠在遠東的障地。當自治領和美國竭力反對英日同盟之後，由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二年這十年間，牠又借藉九國公約來保持牠在遠東的權益。在這一時期內，英日同盟雖已廢除，但牠與日本還繼續維持着密切的關係，牠企圖利用日本來排斥美國，防禦蘇聯，鎮壓亞洲大陸上（特別是中國）的民族革

命運動，以及保持牠在華中華南一帶的巨大利益。

一九三一年，日本的侵略滿州，是在英國支持之下進行的。當時英國默認華北與滿蒙是日本的勢力範圍，拒絕使用九國公約，一方面壓迫中國政府聽信國聯，採取不抵抗政策，一方面則竭力把日本的侵略刀鋒轉向蘇聯。反動的英國統治者希圖以一石殺兩鳥，結果日本終於直接孤立了美國，間接支配了中國，若無其事地佔奪了整個的滿州。

正如我們所知，日本的侵略東北，只是牠整個的大陸擴張政策的一部份。牠接着又利用了帝國主義列強的反蘇情緒與相互間的敵對，在一九三七年發動了更大規模的侵華戰爭。日本侵華的目的，是把英、美、法、日等列強支配下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化爲日本獨佔的完全的殖民地。日本軍閥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把所有的帝國主義勢力逐出遠東。這是英日兩國之間的宿命的矛盾。隨着中日戰爭的展開，受到最大打擊的，就是英國。日本陸軍轟毀和搶奪英國在華的大小工廠，日本海軍射擊和堵截英國的軍艦和高船，租界被封鎖，利益被侵佔，貿易被阻斷，產業被搶奪，英國大使、陸軍參贊，商人，工業家被殺。

傷，逮捕或侮辱，整個的英國租界實際上成了英國僑民的拘留集中營。在這種情形下，英國的遠東政策又是怎樣的呢？

當我們把三年來一連串的事實加以考察之後，我們就可以明白，英國的遠東政策是一個複雜的產物，但牠有一個基本的原則，那就是牠不斷地謀與日本取得妥協。我們在分析牠的整個遠東政策之前，不能不先記取下列三點：

第一：直至七七事變之前，英國在華的利益，比任何帝國主義列強都要大。牠的投資完全集中於中國的通商口岸，這就是說，完全處於日本海陸軍最易侵入加控制的地帶。武漢陷落之後，英國在華的投資，除香港而外，都在日軍佔領區之內。

第二：英國近數十年來，都是撲滅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運動的「聖手」。單就最近三十年來牠的對華政策而論，牠跟日本帝國主義差不了多少，首先是不斷地勾結中國的封建軍閥與官僚，發動無休止的內戰，以破壞中國的統一；接着就是使用金融的和政治的壓力，把已「統一了」中國的政府，成爲服侍帝國主義利益與壓抑民衆

革命運動的代理機關。中國的民族革命戰爭如果獲得勝利，無疑是亞州殖民地體系崩潰的開始，這是大英帝國絕對不能容忍的。英國統治者固然不願意日本獲勝，但她更不願意中國獲勝。

第三：由於英國軍力的單薄（特別是在遠東方面）和牠對蘇的仇恨，使牠無時不希望聯盟政策的復活。特別是在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爆發之後，牠更想與日本妥協，以換取日本的善意，一面藉此以保存牠的在華利益，一面則以日本爲牠的同盟。

上述三點，使英國的遠東政策成爲反動的妥協的，以犧牲中國利益來滿足日本慾望的政策。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明白，英日之間的矛盾，就規模與性質而言，都不如英德之間的矛盾。後一種矛盾是世界性的，牠關係着大英帝國的存亡，屈服在德國的威力之下，就等於交出牠的霸權；等於大英帝國的沒落與其殖民帝國的瓦解。英日的矛盾畢竟只徧於遠東一隅，又有上述三個條件的限制，所以這矛盾決不會也不能達到須用戰爭來解決的地步。本年四月一日上海字林西報在論到英國的遠東外交政策時，曾這樣說：

「值得慶幸的是，在歐戰爆發之前，英國已採取了現實主義的政策，使遠東本已嚴重的外交形勢，不致更加惡化。……無論如何，強大的日本，對遠東的和平與幸福極關重要。歐洲事態的發展，已清楚地指出，當前最主要的禍患，仍然是俄羅斯。別弄錯了：日本乃是遠東反共的堡壘呵！」（註一）

這就是一個權威的說明，現在讓我們把三年來英國的遠東政策作個概括的敘述。

一 戰爭初期英國的不干涉政策

當日本軍閥在華北發動新的侵略的時候，他們非常重視「九一八」的經驗。日本軍伐明白，一九三一年英國曾經拒絕美國的要求，英國保守的死硬份子，始終不願與美國合作，用九國公約來制裁日本，因為他們把日本侵華的軍事行動，看作武裝干涉蘇聯

（註一）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是遠東英國主要的機關報，牠的論說，可以代表英國官方的見解。

的先聲。英美對華政策的分歧，使日本順利地併吞了中國的滿州。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日德反共公約的簽訂，顯然是一九三七年侵華新浪潮的前奏，也是欺騙英美的烟幕。戰爭發動之後，日軍在華北的戰略，也着重於反蘇的目的，他一面在蘇滿邊境配置了數十萬的大軍，一面又命令侵入華北的日軍，首先向察綏疾進。不錯，日軍要確佔華北和平津，首先必須確佔察綏，但這也是日本軍閥的外交把戲，其用意是向英美保證，日本侵華的主要目的，乃是反蘇，遠東有關的各資本主義國家，必須保持中立的和不干涉的態度。

在這時候，英國的態度是很明白的：牠一面希望日本的侵略不要擴至黃河以南，一面又要求中國不要抵抗日本在華北的侵略。一般說來，華北向來屬於日本的利益範圍，只要牠的侵略不會伸至華中華南，英國在華的利益，並不致遭受何種重大的損失。（註

二）

（註二）英國在華北的投資，天津約八、〇〇〇、〇〇〇磅，北平約五〇〇、〇〇〇磅，總全數只及在華總投資數百分之四。

八月二日，當中國大軍向華北出動的時候，字林西報曾表示過這樣的意見：「我們希望這報告並不確實，並希望中國在華北的政權，能運用最好的方法，使牠的人民忍受侵略者統治中國土地能力的新表現。」牠又說，南京拒絕日本對華北的要求，證明了牠「不能把握七月七日所發生的危機的迫切性。」當日本的侵略僅限於華北的時候，字林西報始移勸中國當局「把握現實」，停止軍事抵抗，因為「對抗日軍的壓倒優勢，結果必然毀壞中國的進步和成就，而且必將危害中國的統一。」他屢次警告，中國進行抵抗，必遭日本「完全征服。」在八月四日的一篇社評中，牠這樣「忠告」蔣委員長道：

「蔣介石將軍會始終確信以超人的忍耐，對日本維持和平。要是中國仍能沿着復興的路線前進，縱然領土的完整再遭破壞，只要不礙及牠的行政組織，那麼繼續把這種確信維持下去，不是也很值得嗎？」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英國對於日本侵略的態度。英國不唯完全無意引用九國公約，而繼續採取「不干涉」的態度，他甚至勸誘中國忍受日本的侵略。從七七事變起，倫

英官方的沉默和英國駐華大使的活動，都證實了字林西報的主張，足以代表英國全般的見解。

但是八月七日，日本海軍在吳淞口和黃浦江的集中，使上海局勢非常緊張，華中的衝突似乎是不能避免的了。字林西報的論調至此就有了新的改變。在八月十一日的社評中，牠說：「中國當局是不能讓他們上海周圍的領土，受着這麼公然的威脅，而毫不作任何應付的準備的，雖然他們希望避免這區域中的衝突。」

在一星期之前，這英國代言人還勸中國忍受日本的侵略，現在他却讚揚中國抵抗侵略的準備。在他們看來，好像只有華中的侵略才應該抵抗似的。英國前後態度爲什麼這樣矛盾呢？

我們要曉得英國在華中和華南的利益，是十分龐大的。直到一九三七年爲止，英國在華的投資，比其他各國都來得大。近百年來的對華侵略，已使英國的資本，在中國國民經濟的各部門，奠定了異常穩固的基礎。甚至日本在華中和華南兩地的勢力，也不能和

英國的相抗衡，英國在華投資的分配情形，據美國雷麥教授一九三三年的調查，是這樣的：（註三）

上海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鎊
香港	三五、〇〇〇、〇〇〇
天津	八、〇〇〇、〇〇〇
漢口	四、〇〇〇、〇〇〇
廣州	三、〇〇〇、〇〇〇
北平	五〇〇、〇〇〇

由上表看來，英國投資的主要集中點，顯然是在華中與華南。又據上海日文報每日新聞一九三九年的調查，（註四）英國投資的總數是一、一八九、〇〇〇、〇〇〇美金，其中二二五、〇〇〇、〇〇〇美金是中國政府的債款，其餘五分之四，就是工商業的各項投資，而此種投資有百分之七十，即集中於上海一地。

（註三）見一九三三年紐約出版G. Remer 所著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第三九七頁。

（註四）見一九三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上海日文報每日新聞。

日本的侵略如果展延到華中，英國的利益必然要受到嚴重的打擊。這就是字林西報所以稱讚中國準備抵抗的理由。英國雖然希望中國在華中抵抗，但牠本身却沒有放棄「中立」的和「不干涉」的立場。日本進攻上海的理由，是中國向日本「挑釁」這是日本慣用的藉口，但英國却仍然加以接受，應允日本利用租界，作為進攻華軍的根據地。英國主要的意旨，是在把華北與華中分開的基礎上，出任調停，使日本侵略局部化，藉以保存牠的利益。換句話說，英國又想利用「一·二八」時的方式，來結束華中的戰爭。一九三一年英國曾把上海的戰事與日本在東北的侵略分開來，加以局部的解決，成立了所謂淞滬停戰協定。

但英國此種企圖並沒有成功。日本並不希望英國出任調停，因為牠的進攻上海是「打至中國屈膝」的整個計劃的一部份。江浙——特別是上海——是當時南京政府的主要根據地，也是歐美各國在華利益的中心。要達到征服中國的目的，戰事就必須擴展至華中。「一·二·八」停戰協定的條件，已不能使日本軍閥滿足了。他們至少要中國

成立義日政府，簽訂反共同盟，和實行中日合作。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日機轟炸並掃射了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八月二十八日，林西報的社評，曾嘆惜日本的子彈，竟使一個人失却了活動能力，這個人在去上海途中，原是跟結束上海戰爭的國際努力有關的。該報又揭露了一個「公開的祕密」，說許閣森在南京時，已爲和平使命「盡了最大的努力，甚至在上海和南京的戰事發生之後，他還沒有放棄他的希望。」然而日本所求於英國的，是繼續採取不干涉態度，而不是出任調停。甚至連倫敦所發動的在上海四圍劃定中立地帶的建議，也爲日本所拒絕。

當戰爭局部化的企圖失敗之後，英國便嚴守中立的和不干涉的政策。眼巴巴地看着在華利益不斷地被日軍摧毀。論單上海一地，英國所受損失據估計達七千萬鎊，約佔在滬全部投資百分之五十。英國當時之採取這種政策，顯然由如下兩種見解出發：第一，中國的抗戰沒有勝利的希望，最好的辦法就是竭力保護在華權益，再於適當時機出任調停。第二，英國不能也不必與日本發生衝突，一切的行動應避免刺激日本，同時由承認

日本在華北與內蒙有自由行動的權利，把日本的刀鋒移向蘇聯。英國的統治者曉得：要保護牠在華的權益，只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強硬的，必須以武力爲後盾，而不惜與日本發生衝突；一種是謙恭的，那就是與日本妥協取得諒解，而爲日本侵略者的幫兇。英國顯然採取了後者。一般說來，在華有關各個帝國主義列強的態度都是如此。

因此，日本本來只在華北獲得事實上的「交戰國的權利」，現在他又迅速地把它這種權利伸展至華中，最後，日本軍閥已明白，即使把海上封鎖伸展至華南，也決不會引起列強的反對，於是在九月七日，日本便宣布封鎖由秦皇島至北海的全部中國海岸。這就是說，他已不必害怕列強的干涉，而可以運用整個戰爭機構來對付中國了。這是日本的勝利，但不是對中國的勝利，而是對英美法的勝利。

這就是英國在戰爭初期所採取的政策。這政策是否是「中立」的？是否是「反侵略」的？是否有利於中國的抗戰的？我想讀者一定已有了確定的解答。

二 國聯和不魯捨拉會議

英國這種幫助侵略出賣弱小的帝國主義政策，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三日至十月六日的國聯第十八屆大會上，有了積極的發揮。

當諮詢委員會決定譴責日本空軍時，中國代表主張決議草案中，對轟炸中國平民一點，必須說明係日本所爲，但英國代表克蘭波則堅持只須作一般的譴責，而不必指出日本，他恐怕公開的譴責會觸怒了牠。在蘇聯和紐絲蘭代表力爭之後，英國代表方才接受比代表所提的折衷方案，即單用「日本空軍」而不用「日本」字樣，以縮小譴責的範圍。其次，諮詢委員會在討論中國代表所提出的決議草案時（即主張對日本侵略中國領土，加以紀錄並譴責。在十八屆大會上，中國代表始終未曾要求制裁日本）英國代表則主張於查明之後，再作決定。當時蘇聯代表李維諾夫立刻提出質問：「現有之事實，豈尚不足證明日本之罪狀？我人豈尚不知侵犯中國領土者乃日本乎？我人豈尚不知日

本之領土，絕未有中國軍隊之足跡乎？」然而英國代表克爾波仍然主張「有確實查明之必要。」並要求國聯會祕書長起草備忘錄一件，「對遠東實際情形，包括中日雙方情報在內，以第三者立場，加以說明。」

上面這兩隻插曲，不唯說明了英國對中國抗戰的態度，也說明了國聯之所以半身不遂的原因。英法是國聯的領袖會員國，他們的言論和主張，足以決定國聯的決議。但英法對日本的侵略，並不想加以制裁，在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滿州時是如此，在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新侵略時，也還是如此，因此國聯的威信和盟約的尊嚴，一掃無餘。

值得注意的是，是一九三一年英國的政策為利用國聯，同時又迫使中國信賴國聯，以避免九國公約的牽累，並使日本得以自由行動；但在一九三七年，英國的政策，却因歐洲的危機與英國對德義的關係，又害怕因國聯處理遠東戰爭而受到牽累了。他把整個責任卸給美國及九國公約會議，並警告中國不要信賴英國和國聯。英國有事於歐洲的藉口，已成爲英國不能觸犯日本的理由。假如英國一九三一年能和美國合作，那麼牠不唯

可以維護九國公約，而且當時國聯的決議，也可以獲得美國的支持；同樣，一九三七年如果英國決心把國聯盟約付之實施，那麼蘇聯和美國也一定會竭力加以支助，從而以集體安全的制度，來制裁日本侵略者。然而英國因為熱中於反蘇和害怕殖民地的民族革命運動，牠甯可讓日本得到行動的自由。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布魯捨拉召開的九國公約會議，也因英國的外交策略而決定了牠的結局。英國保守黨報紙，在會議開幕之前，便已預言了牠的失敗。英國始終迴避與有關各國的合作，竭力設法以與日本妥協和接近。英代表雖然發表了許多學院式的演說，高論條約的神聖，但他所關心的，是邀請日本參加，而不是採取有效的行動：如實施經濟制裁之類。結果大會連一個決議也沒有通過，就宣布無期擴會。

三 海關協定

布魯捨拉會議，只是英國企圖與日本妥協的第一個步驟。一九三八年五月，英國又

進一步與日本締結中國海關協定。根據這協定，英國已把中國政府的主要稅收，全部送給日本。

英日關於海關協定的締結，是英國遠東政策正式承認日本對華侵略，並在實際上承認傀儡政府的一個決定步驟。這協定承認南京的「維新政府」有權指派江海關的監督及其他日佔領區的海關的負責人，並答應將江海關的稅收，全部存入橫濱正金銀行。這協定由中國海關總稅務司梅樂和 (Frederic Maze 英籍) 簽字認為合法。

在這次協定締結之前，總稅務司還把到期的庚子賠款付給日本。梅樂和這種行動，是完全違背中國政府止付日本債款的命令。的海關協定無疑地更確定了以梅樂和為首的中國海關英藉職員，已並非為中國服務的海關關員，而成爲日本侵略軍的幫手。英國和總稅務司擅自處置中國海關的行爲，不惟背叛了中國的利益，而且破壞了英國參加的九國公約。所謂「尊重中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行政的完整」的諾言，已完全爲英國所破壞。

日本從這協定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在日本侵略軍幫助之下，華北和華中的傀儡已修改了關稅的稅率，使日本獲得了極大的特惠，因此牠差不多完全控制了整個華北地區的對外貿易。在中日戰爭之前，日本只佔中國的總輸入額百分之二十。但到了一九三九年六月，即海關協定締結一周年之後，日貨輸入額已佔全中國入口貨百分之四十，日佔領區入口貨百分之五十，華北入口貨百分之七十。至日本組織的大規模走私，還沒有計算在內。（註五）

其次，更重要的一點，是日本已能夠動用中國的稅收，來作為征服中國的用費。自一九三八年六月一日，至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止，日本佔領區內各海關關稅收入，佔全部收入百分之七十至八十。這筆巨大稅款，都存在正金銀行，直到去年六月為止，其總數已在二萬萬元以上。（其中有一半是江海關的稅款。）（註六）中國海關的稅收，本來是

（註五）見麥文審勒士評論報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

（註六）同上。

許多外債的担保，每年大概須付出本利約九千五百萬元至一萬萬元。日本既控制了百分之八十的海關稅收，牠至少應付出百分之八十的外債本利。但自海關協定簽訂到現在，日本始終沒有付出一個銅板。重慶政府本來已有充分的理由拒絕照付，特別是因爲出賣了中國海關的，乃是中政府最大的債權人和高利貸者，也即中國海關的管理者英國。然而正如衆所周知，中政府跟芬蘭一樣，從不願意對不起各個帝國主義政府，特別是關於債款的問題，因此牠終以收入百分之二十的關稅，付出百分之一百的爲關稅所担保的外債本利，一直繼續了九個月。等到中國實在無力償付的時候，倫敦城金融資本家竟在證券市場上貶低中國各證券的價值，使國民政府在利益與信用方面受了頗大的打擊。

據上海著名金融評論家安煦勒(John Ahlers)的調查，存在正金銀行的全部稅款，都由日本軍閥隨便支配動用，其中有一部份已被用作抵押，一部份則已耗去。日本的動用稅款，有政治的財政的，和軍事的三種用途。(註七)

第一橫濱正金銀行以巨大借款給北平及南京兩傀儡政權，而以中國關稅爲「担保」。但實際上，正金銀行所予的借款本身，就是關稅的收入，不過牠由此可以從中奪得巨大的利息，其利率之高，與聞名的西原借款相似。

第二，正金銀行以關稅的收入，在上海公開金融市場上易取外匯，作爲日本向外購買軍火及軍需原料之用；同時，因正金大批搜購外匯，又助長日本毀壞中國法幣與耗竭其外匯準備的陰謀。

第三，在某種場合下，日本軍費以關稅支付。

據安煦勒的說明，英國當局之所以同意日本控制中國關稅稅收，顯然懷着兩項目的：第一，牠希望海關閉權得以完整，這關權是操在英人手中的，而且大部份職員都是英國人；第二，英國當局希望借此保全外債持有人的利益，因爲英國是中國外債最大的債

(註七) 見安煦勒氏所作日本違法攫奪稅收及使用海關稅收二萬萬元一文（一九三九年六月號）

氏評論報

主。不管英國是否達到牠的目的，牠顯然以中國的利益爲其犧牲。其他有關國家，事先對海關協定既未提出反對，事後對日本的霸佔稅款，又不提出干涉，所以也須分担一部份的罪責。日本軍閥得以中國稅收購買子彈，用來屠殺中國軍民，這是不能不感謝英國政府及其執行人巴樞（Ed. T. Hall-Parish）英國遠東各使館金融顧問，海關協定的實際談判者，曾與滿州傀儡及日本當局進行多次金融問題的談判）但中國民衆却永遠不會忘記英國這種幫兇的，出賣中國民族利益的行動。

四 誰資助了日本？

除了直接資助日本，像英日海關協定等之外，英國銀行家還給予日本軍閥以間接的財政援助。例如，華北開灤煤礦公司，現在仍在日佔領區爲日人服務。一九三八年，英國曾以一百萬磅的借款，給與這煤礦公司，使牠增加生產，供給華北及華中日軍的需要。此外，「倫敦城」——英國的金融中心——對維持日元的匯率，也起了不少的作用，這是

誰都知道的祕密。因為倫敦銀行每年收到日本證券的利息，在一萬萬日金以上。

一九三八年春夏兩季，中國正經歷着牠很艱難的時期，華北大部份已爲日軍佔領，上海南京又已相繼淪陷，而日軍正動員大軍向武漢進攻。當時中國政府亟欲取得外債以維持法幣，並用以購買軍火與開發西南的富源，因此屢次向英國接洽，但英政府一味拖延，西門也屢次表示反對。直到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張伯倫才拒絕中國的請求，並公開在衆院宣言：『我國決心用盡一切方法，使英國在華利益，不受事變的損害。至於此次事變，我們並不負任何責任，同時也無任何興趣。』這時候正是張伯倫的綏靖政策的黃金時代，他的一切措置，都在直接間接的援助侵略國家，再過一個多月，他便和希特勒簽訂了慕尼黑協定。

張伯倫此項演說，顯然是代日本張目，跟英國所簽的九國公約，凱洛非戰公約，以及不魯拾拉會議的決議（這會議雖無結果，但曾號召各國援助中國）完全矛盾。這演辭甚至引起了保守黨著名人物的反對，如李頓爵士和李滋羅利等，都主張財政援助中國。

英國政府和銀行家在中國抗戰的緊急關頭，雖公然拒絕援助中國，但同時對日本的侵略戰爭，却給予許多有價值的效勞。日本是一個島國，海運對於戰爭，特別是運兵至中國大陸，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戰爭剛開始，日本就感覺到本國商船的不敷應用，因此除竭力減少民運增加軍運之外，還迫切需求外輪的援助。於是英國便首先效犬馬之勞。截至一九三八年七月為止，日軍的運輸，共用了一百七十五萬總噸量的輪船，其中有九十萬噸，即一半以上，主要是由英輪供給的。（挪威，希臘和丹麥等也供給一部份，但為數甚少。）由此，我們可知，一九三八年秋進攻武漢的日軍及其軍火糧秣，有一半是由英輪運輸的。（註八）

英國也跟美國一樣，在日本的對外貿易上，在日本重要軍火原料的供給上，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據倫敦財界機關報金融新聞所說，一九三八年前十個月，由外國輸入日本的貨物，有百分之二十是英國貨，一九三七年全年則佔總百分比百分之二十一。至

（註八）見一九三九年八月號的 Asia 紐約出版。

於英國運至日本的軍火和重要軍輸原料，一九三七年爲一四·一六八·五一三英鎊，一九三八年則爲一二·六七五·九〇八英鎊。（註九）前者佔日本軍火及軍需原料總輸入額百分之二十二點二後，者則佔百分之二十點六。這一點，英國統治者並不想加以掩飾，一九三九年七月，台維斯就會公然在上院作了如上的招供。（註十）

英國曼徹斯特衛報所發表的，一九三八年各國供給日本重要軍火原料的比較，充分說明了什麼叫做英國在遠東的不干涉政策。（註十一）

美國	百分之五六·〇〇
英國及其殖民地	二〇·六九
荷蘭及荷屬東印度	八·六二
德國	八·〇〇
義大利	一·〇〇

（註九）見一九三九年第四十三期之World News and Views，倫敦出版。

（註十）見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三日的Times。

（註十一）見一九三九年七月十日的Manchester Guardian。

一九三八年全年，上表前三國統共供給日本所有汽車及其零件百分之六四·八，所有機器百分之七一·二五，所有飛機百分之七七·〇三，煤油百分之九十九·〇九，生鉄百分之九十九·二一，廢鉄百分之九九·二三，鉛百分之九十九·六六，錳百分之一百。

由英國殖民地 and 自治領輸往日本的貨物，一九三八年是這樣分配的：（見上註）

	百分比
大不列顛	一·〇五
英屬馬來亞	九·二二
加拿大	六·〇〇
英屬印度	三·一三
澳大利	一·二八
共計	二〇·六九

加拿大供給日本百分之四五·九七的鉛，百分之九二·二九的鎳。馬來亞供給日本百分之六七·五五的橡膠，百分之九一·六八的錫，和大批的生鉄。埃及和印度則供給日本許多的棉花和黃麻（一九三八年日本全部黃麻的輸入中，有百分之九七·二

六是從印度輸入的。澳大利和南非則供給日本百分之九十八的獸毛。

英國（美國和荷蘭也是一樣）不僅供給日本以軍火及原料，而且還間接以財政資助日本，使牠有力量購買。據德國著名經濟學家史敦的統計，英美荷三國一九三八年共吸收日本出口貨百分之八十二。三、德義兩國只佔百分之三。二、蘇聯則可說完全沒有（同樣蘇聯也沒有軍火及原料輸出，這在第三章中另有詳細的說明。）單英帝國就佔日本全部輸出百分之四十。據前引曼徹斯特衛報統計，日本對英的輸出是這樣分配的：大不列顛佔百分之七。二、印度佔百分之十四。六、其他殖民地佔百分之九。七、自治領則爲百分之八。五。

據俄國遠東問題專家約西查克（K. Youshchak）所說：『英國商行不但購買日本的貨物，並且還資助日本與他國的貿易。例如，據瀋陽和哈爾濱英國商行的消息，僑滿與德義間的貿易，是由英國銀行資助的。』（註十二）同時，因爲日本輸至英國各領地的貨

（註十二）見一九三九年十月莫斯科權威月刊世界經濟與政治。

物激增，以前日本對英貿易本是虧損的（一九三六年入超額爲九〇〇、〇〇〇英鎊）現在反而進益了（一九三八年出超一〇〇、〇〇〇英鎊）（註十三）這樣，日本繼續與英國貿易的結果，不僅可以獲得所必要的軍火與原料，而且可以獲得外匯，以繼續在華進行掠奪戰爭。

另有一件事也是值得注意的，雖然日本軍閥毫不客氣地把英國的利益擠出中國，以及封鎖英國的租界，但英政府直到最近，還沒有採取任何經濟報復的措施，一九一一年英日簽訂的對日優惠條約，仍然有效。美法等國對由華北輸入本國的日常貨，都採用領事簽證制度（註十四）但英國到現在仍然沒有採用。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英國資助中國的情形是怎樣的。英國輸華的軍火及重要原

（註十三）見一九三九年一月三日倫敦的 Financial News。

（註十四）由駐在地領事調查證實該項商品確是在市場上購來，而非日人用壓迫手段逼來的之後，再將出口證給予日本出口商人，這辦法叫簽證制度。

料一向是很少的。現在作者手頭沒有英政府所公佈的正式統計。據一九三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大阪每日新聞的統計：（注意，這統計是在反英情緒高越時發表的，所以必然十分誇大）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英國輸華軍火爲八千二百十七萬日圓，一九三八年一月即減至三千六百九十九萬五千日圓，三月則減至一千七百十七萬七千日圓。不管這數字誇大至何種程度，英國輸華軍火顯已逐月減少。還有一點可以證明的，就是日本外相廣田，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曾在日本議會上表示，英國對華的援助並不大，其數量實爲日本報紙所過份誇張。英國泰晤士報東京訪員許貝士根據可靠消息，也說輸往中國的軍火，以蘇德爲多，英國只佔全數百分之三。自一九三八年夏之後，英國對華的輸出已逐月降低。據本年六月十日路透社由仰光拍出的電訊看來，一九三九年四月至本年三月，由緬甸經滇緬路運往中國的貨品，（包括軍火，汽車，卡車，摩托自動車，電氣機器，醫藥品，糖，羊毛與棉花織品，罐頭食物及五金等）總共三〇、〇九二、三三八羅比，約等於二、五〇〇、〇〇〇磅，而本年三月份的貨物，則爲五、七六二、〇〇〇羅比，約合四八

〇、〇〇〇英磅（註十五）這數目是微不足道的。但我們必須注意如下二點：第一，漢緬鐵路是英美及其他各國對華貿易和軍火輸出的主要交通線，其價值比漢越鐵路要來得大（法國越南當局，現在可說完全執行了日方的命令，二年來該路全未運輸軍火）；第二，上述二百五十萬鎊的對華輸入，尙包括美國等輸出品在內。由此，我們就可以看出英國和其他的帝國主義國家，究竟已給予中國多少的援助了。

五 東方的慕尼黑路線

從「七七」至廣州武漢陷落這一時期中，英國縱容日本侵略的政策，是非常露骨的。英國曾屢次企圖和日本妥協，如克萊與宇垣的談判，同時又想迴過國聯和其他的外交方式，希望日本接受仲裁。據當時都新聞所載，英政府不唯向日本保證，決不借款與中國，並且還暗示，假如日本「完全顧及」英國的利益，倫敦願意在財政上支助日本。

（註十五）見本年六月十一日上海大美晚報。

本紀事報也說：「英國衆院的質問和答覆，說明英國對華的態度，現在幾乎是一視日本對英國在華利益的態度如何爲轉移。」（註十六）同年夏秋間，外報曾不斷登載英國將與日本勾結出賣中國的消息，就當時許多英國要人的公開演說，日本「穩重派」（如西園寺，字垣，湯淺，池田）的贊同與英交涉，和倫敦的泰晤士與東京的朝日等所主倡的調整英日關係的論調看來，這是極近於事實的。

英國政府爲什麼要採取這種態度呢？

第一，這是英國外交政策總路線的反映。一九三八年九月，正是張伯倫的綏靖政策的黃金時代，英國政府顯然也企圖在遠東實施此一策略，使日本成爲遠東反蘇的先鋒，因而不惜以中國的民族利益作爲綏靖日本的魚餌。美國美亞雜誌編輯洛克伍德（W. Lockwood）對英國此種企圖，有着如下詳細的說明。（註十七）

（註十六）見一九三八年八月四日的Japan Chronicle。這是英國在日本所辦的英文報，其地位與上海的字林西報相似。

「事情的相符性會提示一種同樣的努力，即企圖以調解方法來結束遠東目前的戰爭。依據這種論調，日本將會達到牠大部份的目標，同時依舊保持着牠目前的政治的社會的機構，而不致爲長期的消耗戰所磨蝕。牠將要從此被阻，而不致征服中國，因而不致將西方列強利益，一掃而光，同時也不致爲了要作成此事而先使牠自己崩潰。牠的首要佔領了華北，將會留出華南給西方列強的商業，作爲牠們的活動範圍，牠將會被滯留於中國之內而無暇去威脅亞洲東南部的殖民區域。然而牠對於從北方來的蘇俄勢力的伸張，却依然是一堵防禦的高牆。中國也將由是而免去了因延長的交戰而引起的重大的社會改造，而英法兩國被牽入遠東衝突之解免，也可使現時正在困惱中之該兩國，得集中牠們的目標和力量於牠們專心致志的問題——那便是德國的再起。上面所舉的種種，正是使歐洲列強預懷成見的算計，那成見使牠們很願意沿着慕尼黑協定的路

(註十七) 原文見一八三八年十一月的美國的 *Amerasia*，此段出自世界會議發表慕尼黑會議後的世界。

線，去代中國商量出一個講和的方案來。」

但遠東不是中歐，中國不是捷克，太平洋上尚有蘇聯與美國，而中國的堅持抗戰更是一個異常重要的因素，因此英法的綏靖企圖就很難有實現的可能。但無論如何，一九三八年時間英國的遠東政策還是沿着這一路線進行的。

第二，英國以為武漢和廣州的失守，已摧毀了中國的抗戰力量。因此急速想和日本妥協，自任為「和平」的調人，俾日本得不到全勝，而中國不至於全敗。從蘆溝橋事變到中國抗戰將進入第四年的現在，英國一直沒有放棄過出任調停，以結束中日戰事的企圖。

第三，英國金融資本家，希望以對日的妥協來買好日本軍閥，使英日在華的利益能夠並存；同時，英國資本家又相信，日本在中國進行長期戰爭之後，經濟資源已消磨殆盡，因此日本軍閥假如得不到英美財政的援助，決不能收穫侵華戰果的利益。換句話說，他們認為英鎊與美元仍然是萬能的。在這種情形下，日本決不敢排棄英國在華的利益，即

使英國暫時遭受損失，結果還是能夠得到日方的實際讓步。倫敦的主宰者甚至還打算憑這種對日妥協的姿勢，以利用日本的力量，把太平洋上的另一勁敵美國排擠出去。

第四，這時期歐洲的形勢很緊張，英國在遠東的軍力又過分薄弱，新嘉坡只是一個「沒有馬的馬廄。」這一點也影響了英國的遠東政策。自然，這是英國政府不肯在太平洋推行集體安全政策的必然結果。

第五，英國在決定一個政策時，不能不顧慮到各自治領的態度。加拿大、紐絲蘭、澳大利亞等，對於倫敦內閣的政策，是有相當影響的。澳大利亞頂反對對日實施經濟制裁（義阿戰爭時牠也反對經濟制裁義國），因為日本是澳洲出產的羊毛的老主顧。加拿大一向也反對制裁日本，理由跟澳大利亞相同。南非聯邦和愛爾蘭對遠東問題表示冷淡，只有紐絲蘭是贊同制裁日本的。

一九三九年，這一個風暴的年頭，是在歐亞國際形勢都更形惡化之下開始的。沒落

的大英帝國似乎注定要在這年頭里開始遭逢最後的同是也時最大的打擊。

一九三八年九月間的慕尼黑協定，不唯削弱了英國在歐洲的地位和威信，埋下了今日在西歐慘敗的禍根，在遠東，他也一樣受到重大的打擊。日本侵略者再度相信，牠儘可向英國陣地進攻，而不必害怕會受到懲罰。因此延拖已久英日談判（克萊琪—宇垣談判）便告中斷，反對日軍在華南英國利益範圍內展開戰爭的宇垣，終被軍部驅逐。一九三九年二月，日軍佔奪了海南島，完成了對香港的包圍，大批日軍又增援廣州，華南戰事更加擴大，香港的地位完全孤立了。

顯然，綏靖政策是完全破產了。同時更使英國金融資本家驚愕的，是中國的抗戰仍然繼續，而且因汪精衛等漢奸的被排除而顯得更加堅決。日本軍閥對英國不唯沒有絲毫讓步，反而要求英國承認「東亞新秩序」，換句話說，即承認日本在中國的霸權。

張伯倫政府至此已不得不以援助（當然是有限度的）中國的手段來警告日本，一向善於獻媚的克萊琪暫時沉默了，一向只作學院式的空洞決議的國聯，開始號召

會員國積極援華了。隨着美國遠東政策的趨於積極，和對華二千五百萬美金信用貸款的成立，英國也借款五十萬鎊給中國，隨後又撥了一千萬鎊作爲中國法幣的平準基金。這是英國遠東政策最積極的時期。

但我們要明白，英國的這種援助，完全是由保護英國在華利益的立場出發的。英國雖不願意和日本發生公開衝突，但英鎊與日圓自一九三八年春季起，也即自日本開始在華北實行『幣制改革』成立『聯合準備銀行』的時候起，已展開了猛烈的競爭。畢竟日圓的力量過分脆弱，所以英鎊總是佔居優勢。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國政府頒佈了外匯請核辦法，用以防止日本利用在華北奪來的大批法幣，在港滬套買外匯。當時上海的英國銀行和倫敦與遠東有關的金融資本家，對中國政府未曾犧牲法幣準備，以尊重英國在上海的利益，大爲不滿。但後來，英國的金融資本家看清了，在匯率上支持法幣對抗日圓的壓迫，於英國本身大有好處，因此才設立了中英匯兌平準基金。（這一點，也是日本在華北進行反英運動的主要理由之一。）除此之外，英國又援助中國建築濟南公

路和鐵路，這對中國的國防和對外貿易，都有很重要的意義。(註十八)

英國政府這些措施，顯然引起日本軍閥的不滿。同時，日軍侵華兩年以來，並沒有得到預期的速勝，龐大的戰費使日本有限的準備瀕於耗竭，而原料與資源的枯竭，也破壞了日本整個的經濟組織。在這些情形下，日本統治者面對着如下的問題：怎樣才能擺脫這種絕境，尋出日本冒險政策的出路呢？

用軍事的手段來解決這問題已不可能。日本軍閥不能不在別的方面碰碰運氣。現在，他們的新計劃是用挑撥、敲詐、勒索、軍事壓迫的方法，強迫某些列強停止援助中國，再配合對華的經濟、財政封鎖，來摧毀中國的抗戰力量。

(註十八) 英國對滇緬鐵路的建築，有時積極，有時消極，完全以英國的遠東政策而轉移。一九三九年十

一月五日，中國著名工業家兼國際貿易局海關辦事處代表譚家溪(譯音)曾在掃蕩報上說，因英國鐵路材料不能繼續供給，以滇緬鐵路迄未完成。(見二八年十一月六日上海申報)

於是日本軍閥看定了英國。這決不是偶然的事情。第一，英國在中國淪陷區有最大的利益；第二，英國在遠東的軍力很薄弱；第三，牠的殖民地與中國本土相連；第四，英國連年來的妥協政策。第五，日本求之於美國的，比求之於英國的爲多，這就是日本毫不忌憚地煽動反英運動的理由。自然，日本這一政策，多少是與德義在歐洲和地中海敲詐英國的行爲互爲呼應的。因此，一九三九年六月，日本軍閥奪定了天津——美國利益極少的地方——作爲發動反英運動和包圍英法租界的地點。日本在地點的選擇上，多少含有分離英、美、孤獨英國的企圖，這企圖不能說不成功，因爲美國對天津租界的封鎖，一直沒有明顯的表示。

一九三九年春間稍稍積極起來的英國的遠東政策，在日本的高壓之下，終於不得不開始轉變了。張伯倫政府要求日本在東京談判天津問題，結果就締結了舉世聞名的有田克萊琪協定。英國在這協定中，第一承認中國境內的戰爭狀態的存在；第二，承認日本在華有充分的交戰權利，英國決不妨礙日本在中國建立『和平與秩序』；第三，同意

不再援助中國；第四，答應給英國在華當局相當指示，以改變他們的態度。這協定的意義，曾由英國在日出版的新聞記事報加以說明：『英國對華政策的目的，只是爲了保持在華的權益，並非妨礙日本的軍事征略。』

英國承認了上述四個條件，實際上等於對日屈服。英國已由『中立的』和『不干涉的』政策，進而正式幫助日本摧毀中國的抗戰了。

值得注意的，是英國當時要求這協定只在華北實施。這就表示英國願在華北支持日本，促成牠的反蘇計劃，同時牠又要求日本顧到牠在華中與華南的利益。中國的民族利益是不在英國的算盤上的。在日本強迫中國投降的計劃中，關於華北、內蒙和西北區域的計劃是特別重要的，因爲這不唯與日本自負的使命——作爲『遠東反共聯盟』的領袖的使命——有關，而且跟『遠東慕尼黑』的計劃也有密切關係。不要忘記，當田·克萊琪協定締結的時候，英法的代表正在莫斯科進行英法蘇互助協定的談判。當時莫洛托夫曾表示，如日本在蘇聯履行援助英法義務時進攻蘇聯，英法必須加以援助。

但英法代表始終拒絕這一要求，理由是遠東與歐洲不能相提並論。這就是說，英法不唯企圖在北歐留一個缺口，讓德國進攻蘇聯，甚至應允日本有在遠東自由活動的機會，從而使蘇聯陷於兩面受敵的地位。

張伯倫七月二十五日在英國下院會說：「克萊琪聲明並不能說是英國對華政策已經改變。」這是一個荒謬透頂的說法。每當英國對日本作一次讓步，張伯倫或是哈里斯、法克斯，或是白特勒，總要在下院重申所謂「對華政策決不改變」的聲明，藉以掩飾他們那實際背叛了約定和出賣了中國的勾當。當時上海字林西報的論調也是極其荒唐的，牠竟說：「這並非是雙方的外交勝利，而是雙方互相同意的妥協。這協定結果可能使兩國關係好轉，而對中國政府則毫無損害。……這協定從任何角度上看來，都是可以滿意的。」

但上海英國商會却加以斥責，他們的批評可以代表在華英國商人的見解，並證明這協定不唯對中國不利，即英僑利益也遭受損害。他們說這協定「表示英國放棄了在

華的義務約束和合法地位……結果成爲一種可悲的出賣……實際上，牠無異承認日人加於天津英倫的傷害和侮辱……首相曾表示這些都是不能容忍的……乃是合法的。』字林西報東京通訊員在協定成立後數天曾說：『日本方面對英國外交政策這動人的轉變。』『異常高興和滿足。』單憑這一點，已充分說明了得勝者決不是英國，而是日本。當時上海的密勒士評論報也有如下嚴正的批評（註十九）：

『如果英國政府不想對日本的要求，作重大的讓步，那麼克萊琪發表這種表明，實在是難以想像的。這聲明是綏靖的第一步。這第一步是很難回挽的。假如牠不能挽回，那麼就難免朝同要再方面再走幾步。』

但阻礙英國繼續對日妥協的，是美國的態度。在有田克萊琪協定發表兩天之後，美國就咨照日，美日商約自即日起（七月二十四日）六個月後失效。日本方面認爲這是美國有意『增強英國態度』的姿勢，因爲『英國在東京會議中讓步太多了。』（大阪

（註十九）見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密勒士評論報

每日和東京朝日所說)不錯，美國政府之採取這一步驟，懷有如下三種目的：即第一，間接援助英國；第二，預防英日在美國背後互相勾結；第三，向日方表示，美國絕不打算放棄牠對於遠東利益的鬥爭，即使英國向日屈膝，美國還是保持向來的一貫政策。張伯倫政府自然願意利用這一種援助，於是在東京舉行的英日談判就暫時中止。

然而，我們千萬不要以為英國的態度，自此之後，會有重大的轉變，這是不可想像的事情。重慶上海若干報紙，曾不斷鼓吹英美合作。這在理論上固然說得通，但在實際上却難辦到。因為英國始終沒有制裁日本的決心，同時他又懼怕美國獲得中國主人的地位。從一九三一年到現在，英國一貫的政策，都證實了這一點。就美國廢止商約時的情形而論，英國只是借着美國這一援助的姿勢，來保護牠的權益，也就是說，來阻止或反對日方把有田克萊琪協定應用於華中同華南吧了。至於華北的部份，英國是始終願意對日讓步的。關於後一點，華盛頓當局向來也不會反對，東京談判進行了一個月，華盛頓始終保持緘默的態度，就是一個證明。老實說，牠是有意玉成這一地方性的談判的。然而結果因

英國「讓步太多」，簡直使美國在華前途受到重大威脅，這才使華盛頓宣佈廢除美日商約。（關於美國態度，第二章有更詳細的分析）

這樣，遠東慕尼黑的可能性又減弱了。日本依然陷於對華長期戰的泥沼中。中國的堅決抗戰，蘇聯有力的遠東政策和積極的對華援助，以及美日英日間（特別是美日間）矛盾之未能解消，使遠東慕尼黑像一個倏現的幽靈，隨後又隱沒下去。再過一個多月，歐戰便爆發了。遠東形勢至此又進入一個新的局面。在這新的局面之下，英國的遠東政策又是怎樣的呢？

六 歐戰後英國的遠東政策

在歐戰爆發之前，日本給蘇德互不侵犯協定打得頭昏眼花。牠曉得長期而消耗的侵華戰爭，已使牠的地位完全孤立了。因此，阿部內閣一面主張對歐戰採取觀望態度，一面則與有關各國，特別是蘇美英三國改善外交關係。這次的交涉，使英國比以前任何一

個時期，更處於不利的地位，因為英國（法國更不用說）在遠東的陣地，已因歐戰而大削弱了。美國的地位雖然相反而更加提高，但日本帝國主義的所謂「善意的中立」無論如何，將向遠東有關各帝國主義國家索取更高的代價。

英國的態度一開頭，就表現得非常明顯。當然，歐洲的帝國主義戰爭已使牠的遠東政策，只有與日妥協一個前途。歐戰爆發後第三日，倫敦權威方面，即發出如下的消息：

（註二十）

「此間消息靈通人士傾宣稱：德蘇兩國在不侵犯條約成立之後，英日兩國關係，在最短時期之內，可望改善。中國貨幣問題，雖足構成障礙，但或可覓取一種折衷方案，而暫時不作切實解決，庶幾英日兩國，可在遠東實現綏靖之願望。此種折衷方案正在英國政府研究中，行將非正式的與日本政府討論及之。以目下而論，雙方經相互試探意見之後，業已進入「精神上解除武裝」狀態，他日可在順利環境之下，討論各種棘手問題。但英國遠東政策所依據的主

（註二十）見一九三九年九月八日上海大美晚報。

要原則，不致被迫放棄。」

張伯倫在歐洲的綏靖政策，雖然完全破產，但他仍然把牠應用到遠東方面來。當時英國的宣傳，是用蘇德互不侵犯協定來煽動日本離德反蘇。日本記事報在一篇題爲「種公約的死亡的社評中，就說：『日本應採取堅決的反蘇政策，因爲蘇聯的反日是日趨強硬了。日本失去德國是不足介意的，只要牠仍然反蘇，牠反而可以獲得更多的真實的友人。』日本記事報的論點非常明白：日本現在應當以更切實的反蘇同盟，來代替過去三年來那鬆懈的反共同盟，對歐戰則應恪守中立。只要這樣，日本不唯可以集中精力進行侵華戰爭，而且還可以改善『困難的英日關係。』這裏，我們必須指出：從德波戰爭開始直到德軍侵入丹挪的時候，英國的張伯倫政府是始終主張以『東線戰爭』代替『西線戰爭』的，不明白這一點，就不會澈底明瞭牠在遠東方面，爲什麼那樣迫切策動反蘇的戰爭。（蘇芬戰爭是同一種策動的結果，在這次的作戰過程中，英國反蘇的態度表現得非常明顯。）

這使我們想起一九一四年，世界第一次大屠殺時英國的遠東政策。照英國政治家所常用的術語說來，英國的遠東政策，主要地是英國的世界政策的一部份。換句話說，牠以服侍英帝國（其實是倫敦的金融資本家）的最大的利益爲目標。正如「英國皇家國際政事學會」（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所說，第一次大戰時英國的遠東政策「完全附屬在戰勝德國的目標之下。……結果只好暫時拋棄牠的固定的目標，而僅僅把牠看做是英國戰時機構的附屬品。」反侵略以及正義人道云云，無非是一種虛僞的飾詞，爲着戰勝德國，爲着帝國的利益，中國是應該被犧牲的，於是英國就在一九一七年和日本訂了一個密約。中國的山東省，和德國在南北太平洋的利權與殖民地，就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十六日英國駐日大使送給日本外務省的牒文中，正式由英國政府「欣然」送給日本。這樣，日本就正式參加歐戰，而其第一步的軍事行動，就是掠奪中國的山東，佔領旅順和青島。

這雖是二十三年前的事，但英帝國主義者在第二次歐戰時的政策，與這並沒有什

麼分別，只是多了一個目標——對付蘇聯。他們企圖在歐洲（首先是芬蘭）和在遠東樹立反蘇陣線的領導權，然後由促成反蘇戰爭中，來誘惑德國削弱德國，改善他們對德的地位。英國著名遠東記者田伯烈（H. J. Timperley）在英國的遠東政策一文中，曾這樣寫道：（註二十一）

「在相當範圍以內英國於去年歐戰爆發前所取的政策，就脫胎於這個典型（指第一次大戰時英國的親日路線——引者）自從一九三七年夏中日戰爭開始之後，英國的遠東政策不斷地受着歐局的變化的影響。一九三八年初，英國的外交部，忙着向各方面解釋，英國在遠東的海軍實力太弱，在歐洲局面未明朗化之前，又不能調遣援軍，因而英國對於日本的暴行，不能不暫取容忍態度。現在歐戰爆發了，採取這種政策，似乎更有理由。英國外交部的官員說道：「我們既然在歐洲作戰，無論如何，就不能跟日本人翻臉。」英國政策似乎是企圖給

（註二十一）原文載美國美亞月刊，此地係引用申美日報中譯，不過依據原作，把譯文中有意誤譯的幾個地方，加以校正。

中國以最小的精神和物質上的援助，同時又保持，並盡可能改善俄國與日本的關係。他自己不能制裁日本，却又希望美國迫使日本就範。

『以上所說，似乎非常簡單，不過我們還得把另一個因素計算上去，那就是蘇聯的神祕莫測。究竟斯大林準備對付什麼人，是很難預測的。不過倫敦有識見的觀察家，均認為英蘇戰爭的可能性，至少為五十與五十之比。於是英國方面，益發小心翼翼，不敢輕易結怨日本。十九世紀後半期，英國始終疑懼俄國，或有一天，終將兵臨印度邊境，於是與日本締結英日同盟，以備萬一之需。現在同一的疑懼，依然作弄唐賽街的紳士們，使他們因為畏懼蘇聯的緣故，而不得不遷就日本。假如英蘇發生戰爭，英國將力謀與日合作，共同反對蘇聯。』

毫無疑義的，英國政府在第二次歐戰爆發後，正抱着如上的目標而採取對日妥協的政策。現在讓我們再引用撤退華北駐軍，對汪精衛僞中央政權的態度，和克萊琪在東京日英協會的演說以及天津白銀問題的解決，來作為具體的實證。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以牒文通知日本，說英政府因

「歐洲方面的需要」決定撤退華北（山海關、秦皇島、北平與天津）駐軍（由一千名中撤回八百名）。倫敦官場接着切實聲明，此舉既非放棄任何原則，也未出賣中國，但同時又承認「此舉不妨視爲英國準備承認日本所作任何友好姿勢的表示」。（在這之前，英國又撤退過泊於長江的砲艦五艘。）這舉動的實際作用，我們可以略引日美兩國新聞界的反響來作證明。東京合衆十三日電，曾說：「日本對英方此項決定，極爲滿意，認爲是英國放棄華北利益的初步表示。讀賣新聞謂英國此項行動，足證英日關係改善，預料英日間之懸案，今後也有早日解決的希望。」十五日合衆社華盛頓電，也指出美國方面以及華盛頓郵報與霍華德系各報，都認爲「此舉不能以常事視之。」並指出「英國駐軍撤退之後，或將使遠東局面，有迅速之變遷。」就我們看來，英國這種承認華北「既成事實」的行動，是牠一貫的政策，對遠東大局並沒有多大的影響。老實說，受影響的，乃是英國在華的利益本身。兵艦與駐軍的撤退，正是英國遠東勢力撤退與遠東利益消滅的象徵。

我相信以上的敘述，已使諸者對英國一貫的出賣中國，破壞一切英國簽訂的條約而與日本妥協的遠東政策，已有一個非常明晰的概念。然而我們還不能不再敘述英國統治者近半年來的卑鄙行爲。當中國的抗戰行將進入第四年的時候，英國統治者的背叛與無恥，實在與日俱增。假如以前牠的外交是「妥協外交」，那麼今後牠的外交將是「屈膝外交」。這助長侵略，絞殺正義的政策，已充分暴露了西歐帝國主義戰爭的真面目。目下上海重慶各地，那些嘵嘵不休地說英國是個反侵略的援助中國的民主國的人（如胡適郭泰祺之流）如果不是有意欺騙中國民衆，那麼我們實在應當把他們送入瘋人院。事實實在已十分顯明，大英帝國已由日本軍閥的幫兇者，進而變爲日本帝國主義的同盟者了。

在日本軍閥親手扶植的偽中央政權行將出演之前四十八小時，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這個絞殺中國民族利益的劊子手，在東京「日英協會」上發表了一番演說，當場撕毀了英國的「正義」外衣。這痛快淋漓的演說，我們還沒有見到全文。爲使讀者略有

賞欣的機會起見，讓我把字林西報（三月三十日）上同盟社的英文電稿譯在下面：

「羅勃德·克萊琪爵士星期四（三月二十八日）在帝國飯店「日英協會」的宴會上，發表了概述過去數年來英日關係的演說，日本外相有田與秩父公等均爲座上佳賓。

「克萊琪爵士檢討二年半來日英關係的一般趨勢之後，就說，「誰也不能否認兩國過去有着種種糾紛，但也有足使我們滿意的地方，因爲爲兩國政府的明知日所反映的，雙方天然的善意，已阻止一時的嫌隙化爲根深蒂固的憤懣或永久性的釋縛了。」

「大使又說，「在這一時期中，兩國間真正的糾紛，實在過爲誤會與訛言所籠罩。其理最後是會透露的。現在兩國彼此已漸漸明白，以往對方的行動時常被入訛傳。關於這些尙待加以解決的難題，恐怕沒有人比有田外相和本人知道得更清楚了。」

「但我們至少可以這樣感覺」大使接着說：「我們業已排除了一些糾紛，解決了一部份的難題。」他又說他確實感覺到，將來英日關係一定能够改善。「集納主義一向似乎總把爭論當作最重要的新聞，至於意見的一致，則往往爲牠所忽略。」

「克萊琪爵士又說，甚至當他到東京的時候，他就覺得確有一種對兩國政策的異點過份誇張，而對其真正的同點，則加以忽略的傾向。他提到兩國相同的地方，他把宗教的容忍放在第一位，其次，則爲對舊傳統舊習慣的尊敬與愛慕，而這些傳統與習慣，正都是確保兩帝國約穩定與永存的東西……」

「日本與大不列顛，是兩個居於大陸之邊的島國，而且對大陸上的演變都異常關心。方法究有不同，但兩國所奮鬥的目標却完全同一，即永久的和平與保存瀕於覆沒的制度。」

這演辭的含義是異常清楚的，但更值得注意的，乃是克萊琪的演說，完全代表英國政府的見解。哈里法克斯曾在衆院聲明，他對克氏的演說負完全責任。在同日下院的質問中，工黨議員韋治胡德（J. C. Wedgwood）這樣詢問外次白特勒：「克萊琪演說中所說：「兩國終爲同一目標奮鬥，」和「使雙方國策目的，歸於完全和諧，並非有建設性的政治家力所不及」兩語首相已注意到嗎？同時政府將否切實否認此二項見解呢？」這時候政府派議員席上全都高喊道：「不否認，不否認！」而當白特勒的言語說到「政

府並不反對改善其對日的關係」時，政府派議員又高聲歡呼。在我們看來，克萊琪在日英協會的演說與衆院中這種高喊和歡呼，已完全承認日本之侵略中國與西歐戰爭同爲「正義的戰爭」，而日本的侵華乃是爲着「世界永久的和平」與「挽救垂危的制度」！英國雖然曾聯同國聯五十餘會員國和九國公約簽字國譴責過日本的侵略和暴行，但這麼說來，顯然是由於第三者的挑撥，是出之「誤會與訛傳」。請看日本外務省機關報日本泰晤士所說的話：「克萊琪爵士說的真對。我們是亞洲之濱的島國，對亞洲大陸上的一切異常關心。猶如他所說，我們正爲亞洲永遠的和平，正爲保存我們的制度以抵抗「外來的破壞勢力」而奮鬥。……當克萊琪爵士提高「外來的破壞勢力」時，他顯然是指着蘇聯的。」（註二十二）

這里似乎不必再作何種說明。英國的遠東政策，至此已得到了一個非常權威的和非常透澈的解釋了。

（註二十二）見日本泰晤士報（Japan Times）四月一日社論。

克萊琪爵士顯然是揀着機會說話的，因為他知道，再過四十八小時，亞洲大陸上就有一個傀儡政權，一個沒有民衆，沒有軍隊，沒有權力，爲中國全體民衆所唾棄而爲日本軍閥所操縱的偽中央政權出現。這種政權，照克萊琪的話看來，顯然也是爲着『永久的和平』與『挽救垂危的制度以抵抗外來的破壞勢力』而『奮鬥』的，因爲牠一來混着日本軍人的血液，並且標榜着『和平反共』的主張；二來，他根本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帝國的擴大，是牠的一個新構成部份。

由此，我們已可以猜想出，反動的大英帝國，對這新的傀儡政權，將採取何種態度。自所謂『新南京政府』於三十一日成立之後，倫敦官方並沒有明確的表示。美國國務院曾經聲明，決不承認一切偽政權，只承認國民政府爲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但倫敦只說了後半句，另外又添着說：『英國在華保有重大權益，職是之故，英國官廳或將與中國淪陷區之地方當局審慎往來。』（註廿三）

（註二十三）見一九四〇年四月二日上海申報。

之後，英國方面未如美國之表示反對，其故厥有兩端：第一，英國有事於歐洲，無暇他顧，第二，英國在遠東所處地位，以視美國爲困難。（註廿三）這就是說，英國並不反對「新政府」，而且已準備承認「既成事實」，與而傀儡（即所謂「地方當局」）保持接觸。歐洲「反侵略」的戰爭，已成爲英國統治者在遠東從容侵略，幫助侵略的口實了。

事實上，英國一向都採取承認傀儡政權而與之往來的態度。在華北，牠執行漢奸政權的命令，逮捕許多愛國份子，並予引渡；在上海，英國控制下的上海公共租界，先後與所謂「大道市政府」和傅筱庵等成立協定，把他們當作真正的「地方當局」。他承認「維新政府」有修訂稅率，委派海關監督的權限。在引渡天津刺程兇犯時，英外交部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曾給郭泰琪大使以如下的覆牒，其中有一段這樣說（註二十）：

「天津英工部局現擬以此四人（即刺程案四嫌疑犯——引者）交與以往歷年中已

（註二十四）同上。

（註二十五）見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上海申報。

成爲事實上的法院審訊，而執行該法院所發的提犯狀。此舉似與前此執行之數百次者，毫無異點。天津英租界市政當局，實無他道可行。余深信閣下反省後，當贊同若照來牒所開，此四人應在日方反對之下移出天津，而交與中國他處被承認之中國當局，既不可行，也不合理。同時今因不能無期羈押此四人而不審訊，故合解交當地官憲外，別無他法……」

英國政府 向就是採取着這樣的兩重政策，他一面承認重慶的國民政府爲合法的政府，一面又承認各傀儡與漢奸爲事實上的當局，而與之往來。他們對汪精衛的偽政權，自然也不會例外。中國國內有一部份人，聽到倫敦聲明：「只承認國民政府；中國唯一合政府」時，就大喜欲狂，其實，這廉價的樂觀，完全出之於無知與親英的熱情，如以這樣的人來執行國事辦理外交，中國怎能不陷於完全殖民地化的悲慘命運呢？

提到這一點，使我們想起解決天津白銀問題的經過。這是最近英國出賣中國利益的又一行爲，在這里不必加以敘述。但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重慶對英法擅自動用和處置中國白銀的舉動，並未提出抗議。（去年十二月曾由郭大使提出口頭抗議，但當時白

銀問題並未解決，這在事實上已等於默認。本年四月十四日路透重慶訪員曾說：「現聞白銀問題談判的場所，又已移至重慶。據云中國當局在談判之時，對於英國目前在天津所經歷之困難，表示甚大的體會。中國政府此種合理的態度，已在英人中引起良好印象。」證之目前重慶對白銀問題的沉默，這消息大概是頗為可靠的。英國一個「良好印象」，其代價竟達八千萬白銀！我們爲什麼要給英國這個「良好的印象」呢？我們對英國的「困難」，用得着予以如此「甚大的體會」嗎？請問究竟是中國的利益第一呢，還是英國的利益第一呢？

顯然，這樣的外交路線只有促成和助長英日的妥協，從而損害了中國的抗戰。這是親帝的路線，中國的民衆絕對不會擁護這種路線！

七 中國對英政策的批評

在估計遠東的英日關係時，我們不能夠忽視英日兩國間的矛盾。英國在遠東的經

營到現在已整整一百年，中國的市場，已成為構成大英帝國的血肉的一部份。牠在華的一、一八九、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投資，遠比其他各國為巨大。但日本這次的侵華戰爭的目的，却要把中國完全殖民地化，以作為牠獨佔的市場，和未來繼續擴張進而獨霸整個亞洲的基地。因此牠必須靠着軍事的干涉，把牠的各個競爭的對手——英、美、法等帝國主義國家排擠出去。所謂『建立東亞新秩序』實際上就是排除各國——特別是英國——的在華利益的別名。然而英、美、法等國却多少要求維持中國的現狀，也就是使中國仍然成爲個『門戶開放』、『利益均霑』的公開角逐的市場。日本是決不能容許此項主張的，這就是日本與英國等帝國主義國家間的主要矛盾。

在這一點上，英、美、法的利害是一致的。牠們可以組成一個反日的聯合戰線；同時，假如他們有這決心，遠東的另一強國蘇聯，也會毅然參加，因為這可以制止日本的侵略，保持遠東以至世界的和平。我們相信，當時遠東的集體安全同盟如能組成，今日歐洲的戰事決不會實現。但正如衆所周知，反動的張伯倫政府，始終把集體安全制度看作『仲夏

的癡狂症。」他一再拒絕與美合作，以維護九國公約，同時又默許甚至鼓勵日本在華北的軍事行動，竭力想把牠轉化爲反蘇的戰爭。由於與遠東有關的各帝國主義家，特別是英、美兩國間態度的不一致，又由於對日本反蘇戰爭的期待，各國都採取了「中立」的和「不干涉」的政策，因此日本就由華北而上海、華中，由華中而華南，並佔據了海南島與新南羣島，控制了西南太平洋上的主要交通路線。結果反蘇戰爭並沒有實現，而各國在華的利益却已消滅淨盡，其中特別是英國，其所受損害異常重大。

英國當然不能眼巴巴地看着日本把他的利益排除出去。擺在牠眼前的只有三個辦法：一個是對日採取強硬態度，一個是積極援助中國，間接對抗日本；另一個就是與日妥協，而不惜作部份的犧牲。顯然，衰落的大英帝國只能走最後一條路。牠一向是懷着這種政策的，上面列舉的事實便是非常有力的證明。讓我們再把英國權威方面的見解，引在下面：

前首相張伯倫說：「我們對中國事變毫無興趣。」又說：「只要日本尊重英國在華

利益，英國可以改變日本對華政策的態度。」（註二十五）

現首相邱吉爾說：「我們和意大利日本都沒有爭執，我們已嘗試過而且還要嘗試和他們保持最好的友誼。」（註二十六）

代表英國海軍界見解的陀姆維爾大將說：「最好對中國說，牠不應指望我們的援助……除了我們對日親善與讓步的政策，什麼都不能恢復遠東的和平！」（註二十七）

代表英國陸軍界見解的陸軍季刊（英國陸軍領袖的什誌）也表示如下的態度：「我們已站在歧路之前，或是我們必須對日妥協，或是必須對日作戰。其餘都是廢話。我們相信，凡是更熟悉遠東的人，必定可惜英日同盟的破裂，他們都以為，這破裂使歐洲各

（註二十五）後引見一九三九年八月勃倫對東京朝日新聞記者的談話，前引則見於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在下院的演說。

（註二十六）見本年三月三十日邱吉爾廣播。

（註二十七）見一九三八年四月英國的兩周評論（The Fortnightly Reviews）。

國，尤其是英國的利益，受到極大的損害。」（註二十八）

再沒有比上引四例更清楚地表明英國的態度了。在英國帝國主義者看來，中國的勝利比日本的勝利更爲可怕。半殖民地的中國的完全獨立解放，就是亞洲被壓迫民族擺脫帝國主義鎖鍊的開始。希望英國積極援助中國，跟援助芬蘭一樣，完全是一種夢想。

英國對華的援助，決不會超過對日的妥協。上面各節所述的事實，便是鐵樣的證明。歐戰之後，這傾向表現得更加明顯。沒落的大英帝國，已到了不能不捨棄一部份利益來挽救牠大部份的利益了。於是援華的聲音久已不聞，英國統治者所亟亟要求的，乃是調整對日的關係。關於這一點，東京的都新聞曾有詳細的分析。（註廿九）

「英國政府在東京通過有田·克萊琪以及谷正之·克萊琪的會談，在倫敦通過重光

（註二十八）見一九三八年七月的陸軍季刊（Army Quarterly）

（註二十九）見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四日東京都新聞，引時稍有刪節。

·哈里法克斯的會談，企圖接近日本……牠的用意，無非是誘致日本加入英法的陣營，以世界的規模，對德蘇作封鎖戰。英國的意圖大要如下：

第一：英國既動員全部海軍力量參加斯堪的那維亞和北海的戰爭，結果遠東實力幾等於零，如與日本發生糾紛，當然非常不利，只能對日讓步，以博得日本的歡心。

第二：爲了成立對德封鎖陣線，實有杜絕日德以至「滿」德貿易關係，從而轉變爲日英「滿」英貿易的必要。

第三：爲阻止貨物由太平洋通過海參崴，實有獲得日本的諒解與協力的必要。

第四：日蘇關係如有可改善，對英極爲不利，因此亟應盡量妨害日蘇國交調整，把日本吸引至英國方面。

第五：英日關係加強，可以使義大利不至加入德國加戰。

第六：德蘇潛水艇如在太平洋開始活動，英國最聰明的辦法，就是倚賴日本海軍的防衛。

第七：不管英國勝敗如何，爭取日本爲友邦，在戰後辯和會議上，也可能得到不少的助力。

……」

都新聞這分析，大體上已說明了日後英國企圖與日妥協的理由。協約國在歐的戰事愈緊張，英國對日的態度就愈恭順。目下英國對日妥協的決心，已籠罩了英日之間的矛盾。邱吉爾政府已把一切的力量集中在戰勝德國的目標上面，他們也許相信，只要能打敗德國，再度握住歐洲的霸權，那麼眼前一部份的損失，將來決可以得到雙倍的補償。所謂九國公約，國聯決議之類，早已給拋到九霄雲外了。

現在讓我們反過來看一看中國對英的政策究竟是怎樣的。

當我們把這一問題研究一番之後，我們便可以得到一個非常驚人的答案：儘管英國怎樣在明里暗里出賣中國，中國政府還一樣信賴英國政府，期待牠的「熱烈的」援助。一九二五至二七年那種轟轟烈烈的革命外交，在抗戰後是完全被拋棄的。

直到現在為止，國內權威方面和牠的輿論機關，始終把英國當到一個民主的反侵略的主張正義的國家。他們把歐洲的帝國主義大戰稱為「反侵略戰爭」，毫不吝惜地

把他們的同情灌注到協約國方面去。郭泰祺和胡適的歷次談話，也都表現出這個觀點。就是人們的言論和報紙的宣傳而論，我們從未曾看見嚴正批評和責備英國反動政策的文字。但當蘇聯進軍波蘭和蘇芬戰爭發生時，他們却立刻斥責蘇聯的行動爲「侵略」，並給波蘭芬蘭以無限的同情。從這里，我們就可以看出，我國的外交政策，始終沒有擺脫帝國主義勢力的控制。他們雖然從蘇聯處得到最大的幫助，然而一到適當期間，他們還是毫不躊躇地加以非難，藉以表明他們那並非親蘇的立場。

一般地說，自從一九三八年武漢棄守之後，重慶的外交政策已傾向美國。中國輿論所捧揚讚譽的，已是羅斯福和赫爾。但這決不是說他們已厭棄張伯倫，老實說，英國駐華大使寇爾，對他們的影響還是很強大的。直到邱吉爾上台之後，久已疏淡的親英情緒又昂揚了。許多人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時機，中央日報的論調是非常樂觀的，並希望「世界文明份子，隨英政府之改組起而切實聯合，以恢復世界中之和平與秩序，而謀各種爭端的合理解決。」（註三十）聰明的讀者至少可以從這里聽到一種弦外的和平之音。與歐

府有密切關係的大公報，也要求邱吉爾表明態度，好像大英帝國的政策，將因邱吉爾是一個「幹練勤奮，當機立斷」的人，而有所變動一樣。其實不論是邱吉爾或是張伯倫，他的政策完全以服侍大英帝國為目標，決不會因邱吉爾的性格可愛而改變。老實說，在他們眼中，中國是一個半殖民的國家，跟埃及並無軒輊。因此邱吉爾答覆大公報的熱情的呼籲的，就是把天津的八千萬白銀交由日本控制。大公報曾說：「過去十年中中國政府主要的外交政策是親英的，老實說，我們的外交政策很吃了親英的虧，而且吃虧不小。」（註三十一）這是一個很坦白的招供，但我們必須補完一句，邱吉爾政府對中國的親英政策也一樣是不會買帳的。

但英國反動政府的政策十分狡猾。他曉得中國人很愛面子，他又曉得英國的人民大眾是擁護中國抗戰的，因此每當他們與日本的買賣成交之後（如克萊琪有田協定

（註三十）見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三日上海申報。

（註三十一）見五月十五日大陸報的路透社英文電稿，但在同通訊社的中文譯稿中，這兩句是被刪去的。

等)他們就在下院宣佈:『政府的遠東政策決不改變。』這是一個固定的公式。然而三年以來,英國政府已由一個『中立國』而變爲日本帝國主義的幫兇者和同盟者了。

國內那些親英美的輿論使者們,一向就把雞毛當令箭,利用英國政府這公式的聲明來掩英國的出賣,來掩飾他們的親帝政策的錯誤,使中國民衆繼續尊重 and 期待英美政府。今年中美日報三月二十七日的社論就這樣說:『英國畢竟是一個有遠見的大國,深知日本侵略政策存在一天,遠東即無和平秩序可言,而英國在東方的龐大利益,也決無安全可言。白特勒氏就是針對着這種情勢發言,而給日本軍閥以重大的打擊,並且增加中國軍民以無限奮鬥勇氣的。』按當時白氏曾說,英國去年貸華的三百萬磅借款,可全數供華方支用,同時新借款正在進行中。但據我們所知,郭泰禎在四月五日還向哈里法克斯訴苦,說英國一直不願把定貨交給中國。(註三十二)而所謂新借款云云,到三個月後的今日,還是沒有下文。但中美日報之類,對英日的『慷慨的語言』和空洞的公式的保

(註三十二) 見四月五日同報(中美日報)。

證總是毫無批判地接受的

在中美日報的言論中，英國無疑是一個反侵略國家，但他們從不曾以事實來證明英國究竟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是反侵略的。英國對日的妥協有時的確使他們感到狼狽，但他們甯願忘却這些事實，譬如天津白銀協定的成立，他們簡直不願提及，甚至發表英使館的聲明，說這協定的成立，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同時「對中國的抗戰，也無絲毫妨礙。」中美這種態度，與中國之不願向英國提出抗議，是完全一致的。去年除夕中美社評概然說到：「我們觀察中英關係前途實在充滿光明，英國援華政策，必能積極進展，這不但在道義上是如此，而且在利益上也必需如此。」（註三十三）中美日報一向是異常看重「道義」的，譬如在本年六月五日的社評中，他就把英國當作中國的「道義相助，死生相期，久不要不忘的友國。」然則佔據了中國的領土，勒索了近十萬萬兩的賠款，並在中國子孫身上扣上不平等條約的奴隸鎖鍊的行動，大概也是「道義的行爲」了。老

（註三十三）見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卅日中美日報社評。

實說，這完全是半殖民地的買辦資本家的論點。我們不要忘記，中美日報的背後的支持者。他們相互間的關係，跟中華日報與汪精衛的關係一樣的密切。

寫到這里，我們又想到中國要人另一種尊重「道義」的舉動。據中央社四月十七日重慶電：吳鐵城、龍雲、熊式輝、蔣鼎文、黃紹雄、李漢魂、戴傳賢、居正、陳立夫、王世杰、陳儀等，「以中英關係至深」，對救濟英國傷兵一舉，「義不容辭」。於是慷慨解囊，認捐數目，至少者爲一千及二千。(註三十四)五月二十二日，重慶某華兵出款一元，捐助英國戰時基金會，並致函英大使，說「閱報藉悉，貴國已數獲勝利，殊深欣慰，以其必能驚醒侵略者，而令其自覺行爲之不正也。觀於公德之墮落，貴國人民今負起維持世界和平與援助弱小之責任，誠堪欽佩，茲特奉上法幣一元，捐充救護傷兵經費，聊表予對貴國作戰目的的公正與正義，深致同情。」(註三十五)由這封信，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當局對士兵的教育。或

(註三十四) 見四月十八日上海神洲日報，值得注意的，是蘇芬戰爭時，中國要人不唯沒有諸如此類的

「道義」上的援助，反而痛斥蘇聯。這一點確是值得吟味的。

者竟是假冒爲善者的一種手勢戲。而中國的親英政策，在中國要人與士兵這種行動之間，已表現得點滴無遺了。

但英國當局的舉動，恰恰與這成爲一個尖銳的對照。就在要人們募集捐款之後十二天，新嘉坡的英國當局，竟開槍掃射舉行反日游行的華人，三人受傷，二名重傷。（註三十六）中國政府站在『道義』立場，對此仍不願提出抗議。天津英租界單在本年二月一日，已遵照日方命令，逮捕了十三個男女學生，解交日本憲兵（註三十七）而中國國學大家吳承仕氏，也被引渡，而遭殺害。又據上海神州日報新嘉坡特約通訊員的報告：新嘉坡華僑的救亡活動，簡直完全爲當局所禁止，即參加籌賑工作的侯西反氏也被驅逐回國。『他的罪名是和當地兩個非法團體有關，而這兩個所謂「非法團體」就是「華僑抗

（註三十五）見五月二十二日中美日報，其標題爲『人類偉大的同情』。

（註三十六）見本年五月二日上海大陸報。

（註三十七）見本年五月二日上海奮勤士評議報。

日後援軍」和「抗日民族先鋒隊。」前者是一個擁有數十萬羣衆，包括華僑各階層的救亡機關。新嘉坡英國當局，把華僑的救亡活動，看做洪水猛獸，又向「主導的機關襲擊，首先逮捕了四個抗援的領導者，接着新嘉坡就發生了一起空前未有的罷市，罷工，罷課，罷海，連人力車夫都罷起來的大風潮，要求當局釋放被捕的「四君子。」但結果「四君子」還是被驅逐出境。從這幾點，我們已可以看出英帝國主義的猙獰面目，和他們的所謂「反侵略戰爭」的真相了。奇怪的是重慶不唯未曾援助這些苦鬥的華僑，甚至幫同英國帝國主義者封鎖這種新聞！

老實說，英國統治者及其殖民地警察，對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是非常嫉恨的。他們害怕中國的解放運動，因為獨立而解放的中國，將是亞洲英法殖民地奴隸的大好榜樣，也是英法殖民地帝國崩潰的先聲。英國會屢次把日本當作遠東的憲兵，一面戒備蘇聯，一面鎮壓遠東，特別是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而他今日與日本的妥協，其中也有一個原因，就是恐怕中國革命戰爭的勝利，將使英法在亞洲的霸權完全推翻。斯大林遠在一九

二七年就已說到：

『在過去，在現在，以至於將來，英國資本主義永遠是人民革命最惡毒的鎮壓者。從十八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起，到目下正在展開的中國大革命止，英國資產階級始終站在而且還繼續着站在摧殘人類解放運動的隊伍中的最前列……』

英國三年來在遠東所採取的政策——歷史上所記載的一種最卑鄙與罪惡的政策，完全證實了上說的遠見與正確。在這種情形下，中國而欲親英，那就是自掘墳墓。中國的人民大眾，應當堅決反對反動的地主與買辦階級的親英政策。中國的友人，不是英國的反動政府，也不是美國的反動政府，而是蘇聯和英美的人民大眾。讓我們引用英國著名的左翼周刊世界的消息與意見的話作結（註三十八）

『中國政府的發言人說：「中國只有一個敵人，日本」但我們應該補充說，這敵人還有一個助手，那就是張伯倫！我們英國人要充分警覺……我們要發動民衆反對出賣中國，要給予中國以一切可能的援助，使他得到真正的和平獨立，與國家的主權。只要日本的侵略軍駐

在中國一天，中國上述的目的就決不能達到。」

(註三十八) 見一九三九年 *World News and Views* 第四十三期。

第二章 三年來美國的遠東政策

一 美國遠東政策的矛盾傾向

一般的說，自從一八八九年美國國務卿約翰·海（John Hay）通知各列強，表示美國政府『决不承認任何國家在中華帝國之內有獨佔的權利，或是控制中國之任何部份』之後，美國的遠東政策，就一直依循着這傳統的原則。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之後，美國國際的地位已空前提高，他的遠東政策也表現得更加積極。當時美國提出來的口號仍然是約翰·海原則的繼續，即『開放中國門戶，在華機會均等』。牠利用了他在戰後的優越地位，來確定牠在遠東的權益，把牠所倡導的原則，用國際約束的形式，使之固定化。於是就產生了華盛頓會議與九國公約。

九國公約的締結，顯然含有兩個重要的目的：第一，以美國領導的海軍列強（包括美國與英法）的聯合勢力，來抑止日本在遠東，更廣泛一點說，在太平洋的發展；第二，以聯合各個有關列強而由美國加以領導的中國保護制，來代替英法日的劃分在華勢力範圍的政策。總之，美國當時企圖利用牠在戰後的優越地位，來組成一個由美國領導的侵略中國的聯合戰線，以保證中國的『統一完整』和半殖民地化，並強迫中國履行牠的條約義務，使之成之一個利益均沾的貿易與投資的市場，也即使之成爲這些列強的殖民帝國的一部份。

然而列強在遠東的尖銳鬥爭，並不因九國公約而和緩。英國繼續採取牠的兩面政策，即一面聯日排美，使後者無法獲得太平洋主人的地位，並用以鎮壓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與對抗社會主義的蘇聯；一面又聯美制日，使後者的勢力無從向華南與西南太平洋區域擴張。在英國的遠東政策中，前者顯然比後者更佔重要的地位，於是英美的矛盾加深，而日本就利用這一矛盾，終於在一九三一年侵入了滿洲。當時美國國務卿史

汀生曾要求英國共同起而維護九國公約，但英國却有意成全日本，拒不與美合作，迫得美國不能不採取消極的態度。一般地說，一九三一年前後太平洋的形勢是如此的。

一九三七年日本的侵略已由滿洲而伸至華中，隨後又擴展至華南，美國鑒於一九三一年英美合作的失敗，至此完全採取消極的不干涉的態度。戰事爆發之後，美國禁止軍火運往中日兩國，撤退在華僑民與遷移大使辦公地點等舉動，曾使中國當局非常不滿，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四日蔣委員長對外藉記者談話時，就曾對美國這種「中立」態度，加以批評。這是美國遠東政策最消極的時期，然而美日之間的矛盾，業已從此加深。英國縱容日本的結果，也使牠的利益受到極大的損害。

美國當時之採取這一態度，一方面固然是由於英國的與日妥協，一方面也因爲牠對中國的抗戰表示絕望。然而戰事本身的表現，特別是淞滬間三個月的戰爭，却使華盛頓當局睜開了眼睛。這是一個嚴重的教訓，於是隨着戰事的發展與美國民衆大規模援華運動的展開，美國的遠東政策又逐漸積極了。第二次歐戰爆發前後，太平洋的形勢立

刻有了急劇的變動，隨了英法遠東地位的削弱，美國的地位又空前提高。爲着交換美國對英法的援助，張伯倫和達拉第政府，已不能不把「亞洲警權」讓給美國。在這種情形下，美國的遠東政策就更加活躍。於是牠又企圖利用牠的優越地位，來保持在華的勢力均衡，由壓抑日本以取得牠的太平洋主人的地位。但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已跟第一次歐戰後的形勢完全不同。美國的遠東政策也就有着許多的顧忌，從而使牠現出幾種非常矛盾的傾向：美國政府一面既要保存在華的權益與投資，既要削弱日本以取得太平洋的霸權，但牠又害怕因抗戰而強大起來的中國，會獲得自主獨立與解放，害怕日本的統治者會被推翻，而建立革命的政府，又害怕蘇聯在亞洲勢力的擴張。此外，牠又不願放棄非常有利的對日貿易，事實上終使牠援助了日本而以中國爲其犧牲。所有這些，使美國的遠東政策弄得非常複雜微妙，變化多端，因此要說明美國三年來的遠東政策，不能不從各方面，特別是美國與中日兩方的政治關係與經濟關係，和太平洋國際形勢的發展三方面來加以解釋。

二 從經濟上觀察美國的遠東政策

中國國內有許多，特別是那些領導人物之類，始終沒有認識美國。他們不明白或是裝作不明白美國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在考量美國的政策時，總不由美國實利的和自私的立場出發，而由中國的「道義的」立場出發。曾有一個時期，國內一部份上層人物，曾把極大希望寄託在美國的對日實施禁運之上。他們揚言美日商約正式失效之日，就是美國對日開始制裁之時，但他們這一幻想並沒有實現。就我們所知，所有足以代表中國要人立場的輿論機關，始終沒有一個能說出或願意說出美國不對日本實施制裁的理由。與國民黨有密切關係的上海中、美、日報對這一問題的解釋，足以代表中國大部份輿論的見解。在本年一月三十日該報一篇題為美實力制日，此其時矣的社論中，曾這樣說：

「美日商約自二十六日午夜正式廢止後，至記者屬筆時，已整整三天過去了。在這三天

當中，美政府的態度，依然靜以觀變，不加評斷。國務卿赫爾，依然臥病在床，不表意見，但在冷靜沉默的氛圍當中，襯托出嚴正深刻的決心來，那就是要用「有一天算一天」的辦法，來監督日本，希望牠或有幡然悔禍的一日，改變其昔獨霸東亞的野心，然後未始不可與之議訂新約。……有無論美國這種期望，究竟能否實現，但有一種不願乘人之難，逼之過甚，使之非走入絕路不可的仁厚措置，充分表示出大國風度，恰巧和日本暴發戶式的潑刺作風，形成一尖銳對照，但也正因其如此，所以美國對於日本的期望，無論如何，不能現諸事實，以致非有一日對日採取積極制裁不可。」

這種說法，對美國的頌揚，真可以說是淋漓盡致了，然而惟其把羅斯福和美國神聖化，所以牠才打了自己的嘴巴。既然「美國對日本的期望，無論如何，不能現諸事實」而非「對日採取制裁不可」那麼，牠為什麼要懷着那麼「嚴正與深刻的決心」來「希望牠或有幡然悔禍的一日」呢？在同一篇社論中，又說：「自從去年七月二十六日美國提出廢止美日商約之後，一般人的觀察，以為日本必將稍自檢點，挽回美國人民對於日

本的惡感，以便於商約正式廢止前，另訂新約。然而日本在這六個月內，對美國遠東的利益，依然破壞。』牠又舉出合衆社的報告，證明日本對美國商務活動的限制，日機對美教會產業的轟炸，日軍對美國婦人的侮辱，其次數不比美日商約廢止前的任何六個月的平均數爲低，並其他各種事實而斷言『有一天算一天』的說法，決不能使日本改善對美國態度。這些事實，愈證明美國的故不實施制裁，並不如他們所說，僅在『希望日本的幡然悔禍，』而另有其他的原因，而要說明這些原因，却不能不把美國『凡俗化，』不能不說明美國的自私自利的，也就以是犧牲中國來獲取實利的立場。但這是中美日報這些親美的老爺們所不願爲的。

實際上，美國的外交政策，跟英國一樣是現實主義的，要金融王國拋却實利立場來攷慮問題，完全是一片癡想。中日兩國同是美國的顧客，但日本這顧客要比中國大得多。美國雖不滿意日本侵佔中國，把牠很有希望的一個主顧奪去，但牠却不能不考慮到日本每年有八千萬金元的流入這問題。如果美國在日本對華侵略中所受的損失，並不比

美日貿易的經濟利益來得大，那麼，要她為未來的不可知的利益而犧牲目下的巨大利益，那是不可可能的。

美國與日本的經濟關係，一向比中美的經濟關係重要得多，關於貿易方面，近十年來美國對日本的輸出入，是這樣的（單位一千日圓）

年	輸出(單位千)		輸入		出入超
	輸出	輸入	輸出	輸入	
一九二九年	六五四、〇五五	九一四、一〇二	入超	二六〇、〇四七	
一九三〇年	四四二、八八三	五〇六、二二〇	入超	六三、三五七	
一九三一年	三四二、二九〇	四二五、三三〇	入超	八三、〇四〇	
一九三二年	五〇九、八四七	四四五、一四七	出超	六四、七二七	
一九三三年	六二〇、七七八	四九二、二三七	出超	一二八、五四一	
一九三四年	七九六、三五九	三九三、三二八	出超	三七〇、四三一	
一九三五年	八〇九、六四五	五三五、五一五	出超	二七四、一三〇	
一九三六年	八四七、四五三	五九四、二五一	出超	二五三、二〇二	
一九三七年	一、二九六、五四二	六三九、五四八	出超	六三〇、一一四	
一九三八年	九一五、三五四	四二五、一二三	出超	四九〇、二三一	
一九三九年	九八七、三〇〇	六二三、二〇〇	出超	三六四、一〇〇	

一九四〇年 一八四、二二〇 一一七、七八〇 出超 六六、四四〇
第一季

從上表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國對日的貿易關係，自日本侵略東北之後，即變入超爲出超，每年至少爲一萬萬日圓，多則如一九三七年，竟達六萬萬三千萬日圓之鉅，總計八年以來，美國出超共達二十六萬萬四千二百萬日圓。（約合八萬萬美元。）

我們再反過來看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關係：一九三八年輸出是三四、七一九、〇〇〇美元，約居對日輸出七份之一，輸入是四七、一八九、〇〇〇美元，約居對日輸入三份之一；一九三九年的輸出則爲五五、八〇九、〇〇〇美元，約佔對日輸出四份之一，而輸入則爲六〇、七〇〇、〇〇〇美元，約佔對日輸入三份之一強。這就是說，美國對華貿易，不唯比對日貿易要小四倍至七倍，而且每年要入超五百萬至一千萬美元。（要注意的，是中國對美輸出，因抵償信用貸款的關係而增多，以前本來也跟日本一樣是入超的。）

再就美國在遠東的投資而言，據一九三五年美國商務部所發表的統計，直接的和有保證的投資，總計爲五萬萬一千九百萬美元（還不及英國在華投資的二分之一。）其中對日投資爲三萬萬八千七百萬美元，而對華投資則僅及上數三分之一，卽一萬萬三百二十萬美元。自一九三五年以後，美國在日投資又有相當的增加，華爾街、巨頭、摩根，大工業家福特、鋼鐵工業家拉特等，在開發偽滿和建立鋼鐵工業等方面，都有過大量的投資，特別是福特，一九三七年秋間，他還購買大批日本債券，所以我們可以相信，美國在日投資，近年來只有增加，決不會減少。

在這里值得我們鄭重指出的，是日本經濟對美的倚賴性極大。就一九三九年日美貿易而論，一九四〇年春間美國商務部的統計指出，美貨輸入，佔日本全部輸入百分之四十八；卽日本對美的輸出，也佔日本與非日圓集團的貿易的百分之四十四，其中大半是奢侈品的生絲，（平均約佔日本全部輸出額的三分之二弱，）這在其他的國家，決難找到如此巨大的銷路。日本這一弱點，美國人是十分清楚的。美國沒有日貨的輸入，決不

受任何嚴重的影響，但日本如果得不到美貨（主要是軍需原料），牠的軍需工業就會馬上陷於停滯，以致無法進行戰爭。因此，我們可以說，美國實際上不唯操縱了日本的經濟生命，而且控制了日本侵略戰爭的機構。假如牠一旦實施經濟制裁，日本必須受到致命的打擊。但唯其因日本對美倚賴極大，美國獲利極多，所以美國到現在仍沒有立下制裁的決心。我們要曉得，美國雖有行使制裁的能力，而且這能力充分發揮時，可以制日本的死命。但牠願意行使這種能力與否，却又是另一樁事情。那些根據所謂道義的立場，推斷美國資本家將毅然爲了中國的民族解放戰爭，而犧牲每年四萬萬美元的貿易，和八千萬淨賺的現金的人，實在應該送入神經病院。據胡適（他也是把美國的「反侵略」神話化的一個）本年五月的演講，截至去年十一月爲止，日本黃金流入美國的，共五萬萬一千一百萬美元，又據本年六月美國官方的統計，一九四〇年第一季由日流入美國的黃金，共達五千五百萬美元，所以直到本年三月爲止，日本流入美國的黃金至少已達五萬萬七千萬美元。這不是一個小的數目。在美國資本家看來，世界是再沒有比黃金更

燦爛，更珍貴更『正義』和『反侵略』的了。因此國內那些跟中美日報一樣把美國的行爲神聖化的人，實際上都在幫同美國資本家，向中國民衆詐騙和勒索不應有的親美國感情，而有意無意地成了美國帝國主義者的俘虜與忠僕。

唯其因爲親美國的輿論，在國內像狂瀾一樣，我們必須在這裡拆穿美國帝國主義者的猙獰的面目。正如畢特門所說，『美國是參加日本屠殺中國民衆的罪犯。』（註一）自從日本開始侵華以來，美國的軍火和重要軍需原料，卽不絕運往日本。美國的左手拿着抗議侵略的牒文，右手却以軍火送給日本軍閥。

遠在一九二〇年，列寧在第三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便已指出：『日本本身並沒有任何獨立的財政與軍事力量，假沒有其他國家的幫助，牠就不能掠奪東方的亞洲諸國……』這明確的預言已爲二十年後的事實完全證明。根據一九三九年紐約中國研究院和英國曼徹斯特衛報所發表的統計，一九三七，三八兩年各國供給日

（註一）見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畢特門一九三九年十月二日的演辭。

本的重要軍火原料，是這樣的：(註二)

國別	一九三八年(美元)	%	一九三七年	%
美國	一七四、八五一、四三五	五七·〇一	一七五、〇〇五、三六一	五五·一七
英國	六三、三七九、五四七	二〇·六九	七〇、八四二、五六三	二二·三三
荷蘭	五四、四五九	〇·〇二	〇	〇
荷屬東印度	二六、四一七、四二〇	八·六二	二九、六四、九九二	九·五
德國	二三、五二二、五〇〇	七·六八	九、六七九、四八六	三·〇五
法國	七〇二、四七八	〇·二三	二、一四一、〇一二	〇·六八
義國	一、四一七、〇二一	〇·四六	三二五、四二七	〇·一〇
蘇聯	〇	〇	〇	〇
其他	從略			
總數	三〇六、三九三、九五〇	一〇〇·〇〇	三一七、二〇九、六八八	一〇〇·〇〇

從上表中，我們可知在上二年中，美國（包括菲列濱）運往日本的軍火原料，佔日本軍需總額一半以上。英國（包括馬來半島、加拿大、印度和澳洲）和美國這些「反倭

(註一) 見一九三九年七月十日的 Manchester Guardian。

「略」國家，差不多包辦了日本全部的軍火原料，而「侵略」國家蘇聯，却始終沒有幫助過日本，雖然牠國內的軍需原料（特別是汽油）非常豐富。這一事實，到是值得誇張英美為中國的友邦的人們猛省的。

美國究竟供給日本什麼東西呢？據比遜氏（T. A. Bisson）去年六月在美國外交政策協會報告中所發表的論文看來，美國對日輸出的軍需原料及其數量是這樣的。

（註11）

類 別	一九三八年（單位千元）	一九三七年
煤油馬達燃料及石油	四九、四九〇	四二、〇七五
鋼、鐵及廢鉄	二二、〇三五	三九、三八六
銅	二二、一四六	一八、二一一
五金工業機器	二二、六一四	一一、九〇〇
鋼鐵半製品	六、五二三	二二、〇〇三
汽車及零件	一〇、一四二	一三、五八一
飛機及零件	一一、六〇九	二、四八四

（註12）見一九四〇二月神州日報譯文

合金	二、三三二	一、三三六
鉛	一一、一〇〇	七五四
錫	四七六	二八〇
軍火	一〇〇	四九

從上表里，我們可以看出幾點：第一，輸出的指數不斷的向上增加；第二，不管什麼道義的譴責與輿論的非難，上表十一項目中，只有廢鐵及銅鐵半製成品以及汽車零件，一九三八年比一九三七年稍微低落。其中廢鐵一項，大半是因為美國西岸工人羣衆的拒絕裝運。其餘的一切現成殺人利器，如飛機，軍火，五金工業機器，以至鉛，鋁等都增加好幾倍。

現在我們再看看：在世界各國對日軍需原料的總輸出中，美國所佔的比重又是怎樣的。據華盛頓中國經濟研究協會胡敦園研究的結果，一九三八年對比是這樣的：

世界各國輸日百分比

美國輸日百分比

煤油及石油產品

二六·四五

六五·五七

金屬工業機器	一一·九〇	七七·〇九
鋼鐵及廢鐵	七·九七	九〇·三九
銅	七·九六	九〇·八九
飛機及零件	七·四一	七六·九二
鋼鐵半製成品	六·六四	五三·六五
汽車及零件	六·〇八	六四·六七
金屬合金	〇	九九·三三

由此我們就可以看出，美國差不多一手包辦了日本所需要的飛機和各種軍用原料，其中最少的也達一半以上，而合金、鋼鐵、廢鐵、銅、飛機及其零件，實際上完全為美國一家所供給。華盛頓州參議員舒偉倫巴樞 (Lewis S. Schellenbach) 曾這樣說：『我們說日本有德義兩個盟國，事實上我們才是日本最主要的盟國。』他又說：『在任何人心里，都會毫無疑問地相信，我們正積極參加日本在華進行的戰爭。我不禁感到，日本的地位實際上也許比我們的還要光榮些；至少他們已派出犯被殺的危險的士兵，而我們的性命在這戰爭中却毫無危險。我們只把商品和原料運到日本，讓他們用以作戰，而我們則

從其中獲得利潤。」舒偉倫巴樞接着又提出如下的問題，這是值得親美的人們吟味的：

「在國際的道德上說，供給發射彈子的士兵，和供給製造子彈的原料，究有什麼區別呢？再說，就國際的道德而論，供給車輛的駕駛者，和供給車輛與發動車輛的汽油，究有什麼分別呢？供給飛機師和扳動擲彈機以轟炸和毀滅城鎮與民衆的擲彈手，跟供給飛機和發動飛機的汽油有什麼分別呢？」（註四）

然而，我覺得上面的敘述和數字，還不足以說明美國金融資本家的罪惡。他們對日本的援助是有計劃的，無微不至的。在現代的戰爭中，鋼鐵和汽油是兩項最重要的軍用品。沒有鋼鐵與汽油，便不能戰爭，鋼鐵是戰艦，坦克，飛機，大砲，機槍的生命，而汽油是維持前三項的生命的東西。所謂機械化部隊，摩托化部隊以及飛機戰艦，沒有汽油，就變成僵硬的脫去爪牙的巨獸。美國在這兩方面給日本的幫助是怎樣的呢？

儘管美國的國務卿和參衆兩院，把所謂禁運和道德禁運喊得天花亂墜，可是一直

（註四）見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上海密勒氏評論報轉載，原題爲「不應該出賣我們的民族」。

到現在，禁運並未實行，而所謂道德禁運，範圍既非常小，而且根本上是訴之資本家的良心的，所以也沒有多大的效果。然而資本家們却已預防到這一步，他們正在幫助日本建立最緊要的軍需工業，以對抗這種或有的制裁——讓我們分兩步來說明：先看看美國鋼鐵運至日本的數量。

美國輸至日本的鋼鐵，由一九三六年的五四、〇〇〇噸，增至一九三七年的八八〇、〇〇〇噸，即增加了十六倍，一九三八年爲四八〇、〇〇〇，即增加了九倍，而一九三九最初九個月則爲八六、〇〇〇噸。廢鐵輸日的總量，在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七年，其平均數爲一百萬噸。到了一九三七年，就飛昇至一、八七二、六四六噸，一九三八年爲一、三八一、九〇一噸，在一九三九年最初六個月內，又突然增加爲一、〇三九、〇〇〇噸。這就是說，比七七事變以前各年，要增加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一百以上。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以這樣多的廢鐵供給日本，一九三八年的進口額，雖然是上三年中最少的。但美國所供給的，佔日本全部入口百分之九十。（註五）

上述是一個方面，但另有更值得注意的一方面。美國本薛范尼亞州的畢茲傑聯合機械鑄造廠（United Engineering and Foundry Company of Pittsburgh）已把鋼鐵廠於去年春間賣給著名的日本機械廠——東京的芝浦機械廠（Shinaura Engineering Works），在近年日本的軍需工業中，芝浦是負有非常重要的任務的。出賣的形式，是由聯合與芝浦合組一個公司，由兩方集資一六、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共同合作經營，其中百分之四十九，即七、八四〇、〇〇〇日圓，由美國財團供給，並派出二個人參加該公司的經理部。一個是拉特（George Tallman Ladd），「聯合」的總經理，一個是慕尼克（Charles Muchnic），出口部的總理。「聯合」並負責供給大批專門技術人員，以訓練日本技師與工人，因為日本還不會使用這複雜的最新式的機械。（註六）

這事的經過是這樣的：「聯合」的總經理拉特，曾接受日本大批的定貨，遂購買與

（註五）見本年一月十四日上海神州日報所載美亞月刊日本的鋼鐵來源一文。

（註六）以上事實，見一九三九六月十日上海密勒氏評論報。

希奧州的伍斯特鋼廠，後來因為日本現款短缺，於是拉特把這個廠拆卸，運至日本，其中缺少的配備，則由「聯合」供給。「聯合」是美國最大的鍊鋼廠之一，牠擁有許多新式的發明。所以這鋼鐵廠在日本是最新式的，最大規模的。這新廠的建立，使日本的鋼鐵生產，可以供應國內大部份的需要。正如泰晤士報所說，「這樣買賣的最大目的，是使日本在美國或其他各國對日本實施經濟制裁時，能夠抵擋經濟上的壓迫。」

「聯合」的出賣，並不是破天荒的，在這以前，美國的米斯他機械公司（Messia Machine Company）也有一個比較舊式的鍊鋼機器鑄造廠賣給日本。美國所出賣的，比德國出賣的都要新式。（註七）可見美國資本家對日本的幫助，着實要比德國賣力氣得多，而所謂道德禁運，也只是一個空架子，因為這些侵略利器的出賣，是在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七日，畢特門在參院提議授權總統禁止軍火及各項原料輸至日本之後一個多月出賣的。

（註七）見紐約泰晤士報（五月八日一九三九年）。

多謝美國和菲律賓資本家的照顧，即使美國本部禁止一切鋼鐵運至日本，日本還是不乏鐵砂。直到現在為止，菲律賓鐵砂運往日本的，達一百分之一百。開灤煤礦公司（英商）在菲所經營的鐵礦由一九三四年起到現在，全部生產（約三、〇〇〇、〇〇〇噸）都運至日本。菲律賓最初創辦的菲列濱鐵礦公司，其全部鐵砂也一樣供給日本應用，一九三九年該公司運至日本的鐵砂，達七百七十萬噸。另一個居菲律賓第二位的沙馬爾鐵礦公司（Samar Mining Company），一九三八年開始在沙馬爾採掘，自當年二月起，其全部鐵砂也陸續運往日本。馬林都格的鐵礦，一九三八年開始為金星礦公司所經營，其出產也一樣運給日本。總之，自一九三六年以後，菲律賓如有鐵礦公司創立，那麼，他們的出產就都毫無例外地為日本所收買。經營這些鐵礦的大都是美國的資本。美國資本家對日本的幫助真是無微不至呵。（註八）

至於煤油的供給，也是一樣明顯的。日本本國所生產的煤油，只及全部需要百分之

（註八）見菲律賓雜誌（Philippine Magazine）十一月號 Rizal & F. Garcia 所作之文。

十至十二，因此，牠必須大批購買和堆積，才能適應侵華戰爭的需要。一九三七年九月開頭六天工夫，日本在加利福尼亞州所購買的飛機汽油，即達二千五百萬加侖，隨後兩個星期，又買了一萬萬零九百萬加侖的煤油，以便提煉。九十兩個月，日本在美所購已達三萬萬三千七百萬加侖。（註九）另據遠東事件的統計，一九三七年全年輸日煤油汽油，達三千四百萬桶，比和平時期每年的堆積量要多上一倍。七七事變以前，日本國內所堆積的煤油為二千萬噸，約等於海陸軍一年的消費。現在侵華戰爭已整整三年，日本所消費的四千萬噸汽油，百分之七十都是美國獨手供給的。

所有這些，已充分說明了華爾街金融資本家資助日本侵略者的程度。紐約財政寡頭對遠東大陸上的戰爭，顯然有着決定的作用。他們這種態度，跟美國政府的政策是矛盾的，雖然後者的主張也並不澈底，但牠一向總是保持中國門戶開放的原則，而且反對以戰爭和侵略作為民族政策的工具。在侵華戰爭爆發之後，華爾街的寡頭們，已給黃金

（註九）見 *Pacific Affairs* 一九三八年三月號。

迷了眼睛，他們本來已反對羅斯福的內政設施，如果現在進而故意阻礙羅斯福的對外政策，那又有什麼奇怪呢。

紐約商業時報（Journal of Commerce）的主編博金，在發表於東方經濟家雜誌上，那篇題為美國資本與華北的文章中，曾這樣說：

「美國產業界和金融界一般地並不反對日軍的佔領華北與上海。他們是採取現實主義的觀點的，因而比較傾向於支持日本在空閒上所需要的經濟膨脹。美國抵貨運動之不能大規模展開，有一部份原因也在此。實際上，美國金融界特別努力用一切的方法來削弱這種抵貨運動。」

博金這種說法，並不是代表他個人的觀點，而是美國產業界的意見。他在同一篇文章中，甚至勸告日本當局改變態度，假如「日本政府、軍部和華北自治政府共同發表聲明，表示他們對外國企業投資採取善意的態度，並負責除去對華北外國商業與投資的壓迫」時，美國的實業家一定會毅然參加投資的。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美國的金融資本家是懷着多麼荒唐的幻想。他們這一幻想也許是根據日「滿」貿易的經驗。自從東北淪陷之後，日本爲着加以開發起見，曾從美國輸入了大批的工具與原料，因此美「滿」貿易連年均在增加中，這事實使美國資本家竭力想以他們的資本，來參加日本在華的掠奪工作。他們幻想當日本開發被征服了的中國時，他們的實利不唯能有大規模的擴張，而且將使日本對美的依賴性更加增大，從而使他們在實際上控制了日本與中國的命運。

這種傾向，美國統治當局能加以忽視和抹煞嗎？回答是否定的。羅斯福的政權並沒有充分的獨立性，金融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策，全由他們的後台老板所決定。羅斯福與赫爾的遠東政策，也許是長射程的，但在這種種牽制之下，她就不能有效地附之實施。三年來羅斯福與赫爾會經多次地粗着脖子斥責侵略，彷彿與侵略國家不共戴天，然而實際上，幫日本最甚的正是他們。這又有什麼奇怪呢？

三 從政治上觀察美國的遠東政策

在美國國內，確也有許多人主張反侵略和制裁日本。一種是表面上的，如畢德門一流人，他的主張，我們與其說是正義的呼聲，勿如說是美國壓力政策的手段。當美國要對日本裝腔做勢時，他就出現在講壇上高聲疾呼。但他對中國人所流的眼淚，乃是「鱷魚之淚」。他的反侵略是矯情的。另一種人可以拿史汀生做代表。他的確主張對日實施禁運，他所代表的是較有眼光，企圖保持中國的完整，以便美國資本的滲透的資本家集團。他不滿美國國務院的政策，也不相信日本會尊重美國的權益。一般地說，史汀生的意見，最獲得美國人民的支持，這可以由美國近年來的民意測驗作證。

史汀生之採取這種主張，可以由他給紐約泰晤士的公開信中看出來。他說：

「美國在遠東的利益，並不僅限於目下的商務關係，我們還有更廣大永久的利益。我們是太平洋岸上最大的國家，太平洋彼岸發生的事情，與我們的關係日見密切。過去我們對遠

東會毫不遲疑地負起責任。我們曾經活躍而有力地在那邊散播過道德與文化的種子……我們這種工作，並沒有什麼妄想與不正當的目的，無非是從遠處着眼，來發展我們的利益。我們對遠東大眾的努力，都是想發揮我們的精神，促成永久的和平與安定。我們知道美國日後無窮的利益就寄託在這個路線上面，而中國的獨立穩固，也是維護美國利益的一個條件……」

這一段話，充分說明了「史汀生路線」。牠跟目下的對日妥協論不同。牠是從「遠處着眼」的。更具體一點說，他是看到了日本如果佔有中國，美國在政治上不唯失去了太平洋主人的地位，而且要受到日本的巨大威脅；在經濟上，也將失去中國與日本兩大市場，因為日本可以在中國取得無窮的富源，此後當然不會倚賴美國。假如中國的完整能夠保持，目下即使忍受對日貿易的部份損失，未來仍可以在中國獲得更大的補償；在政治上也保證了美國在太平洋的優越地位。

在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爆發之後，美國所處的地位，顯然更加有利。因為一方面，日

本此後更加依賴着美國的軍火供給。一九三九年十月（即歐戰後第一個月份）日鐵貿易較八月低落百分之四六·二，而日英貿易則低落百分之六三·九；美日商務却相反地增加，八月份牠供給日本全部輸入百分之三七·六，十月後則增至百分之四三·七。另一方面，則是美國已在歐洲獲得了一個更大的市場。中立法法的修正，和歐洲的需要大量煤油，鋼鐵，廢鐵，銅鉛與棉花，使美國即使禁止對日輸出，在經濟利益上，決不會有什麼損失。何況日本是一個窮主顧，牠的黄金準備決沒有英法那樣多。在這種情勢之下，美國從事禁運的條件是極其有利的。

但直至現在，歐戰爆發已將近十個月，美國依然沒有實施禁運的徵象。最近單只禁止機器出口，據說是由於國內的需要，這倒是實在話，所以如果把這作為對日的制裁，顯然是過份樂觀的說法。相反地，自國務副卿威爾斯本年六月初旬發表願與日本改善關係的談話之後，樊登堡又主張與日本重訂商約，美國輿論界如李普曼之流，又突然喊出了改善日美關係的呼聲。要明白這一傾向的根源，我們有進一步從政治上說明美國政

策的種種根據的必要。

正如上文所說，美國的遠東政策是非常糾纏複雜的。牠有着許多顧忌，結果使這種政策成爲一種包含着許多矛盾的產物。現在我們依據太平洋上的國際形勢，把牠的矛盾及其必然的趨勢，作個簡括的說明。

首先當然是日美間的矛盾。美國如要保持牠在太平洋的優勢地位，牠必然要與日本的大陸政策和太平洋的擴張政策相衝突。爲着保持牠在遠東的市場與中國的利益（特別是未來更大的利益）以及牠對於中國政府的權威與地位；爲着保衛牠在菲律賓、檀香山，以及在整個太平洋的奧南美的統制地位，牠必須阻止日本在陸海兩方面的膨脹。這就是日美矛盾的基本根源。美國統治者都明白，如果日本一朝佔有中國，把中國無限的資源與人力移到牠的戰事機構上去，那簡直就是美國的末日。從這一點上着眼，美國之必須及早制裁日本，簡直是無需說明的。

然而，牠可不能不考慮到別的許多因素。第一：牠能夠讓日本的侵華戰爭完全失敗

嗎？這就等於說：牠一方面能讓中國擊退日本的侵略，獲得獨立與解放；另一方面又使日本因戰敗而發生革命嗎？第二，牠能坐視蘇聯勢力在太平洋上的伸張（特別是因爲中國的勝利與日本的革命）嗎？牠能忍痛消滅牠在太平洋的反蘇同志日本嗎？

美國統治者對上面各個問題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他們認爲，如果上列問題的任何一个成爲事實時，美國所受的損害，決不比日本對美的威脅來得輕。美國的資本家正把牠們自己看作『西方文化』也即資本主義世界的最大的保護人，正把美國看作資本主義世界最大的也是最後的堡壘。因此，牠決不能容許上列任何一個問題的實現。這就是牠的遠東政策中所包含的主要矛盾。老實說，這些矛盾是極難解決的。這就是美國遠東政策之所以那樣猶豫不決，左右爲難的原因。

再就對日制裁一事而論，美國的顧忌又是那麼多：第一，就牠本身的商業利益而言，日美貿易是一筆好買賣，每年有將近八千萬美元現金的流入；第二，就牠的實效而言，如果列強未能一致行動，美國的制裁，只能使別國平添一筆生意；當美日商約失效之後，英

國方面就有這種野心。本年一月二十五日倫敦合衆社傳出如下的消息：「一九一一年美日商約，即將終止，英國政府各部對此，意見紛歧。英國外交部謂英國不應利權，將帝國輸出擴至日本，但其他各部，如財政部及經濟部，則主張決某禁種政策，以滿足英國的外匯需要及其他市場。」其實，企圖利用這種機會的，決不止英國，雖然他們不見得能有充分的能力，像美國一樣予以充分的供給。第三：牠又害怕日本的報復，和可能引起的日本的政變。紐約共和周刊本年一月二十二日社論中就說到：「我們反對直接對日的禁運，這樣的禁運對國際影響極大，同時將迫使日本憑藉武力以奪取原料供給。」第四：牠害怕這種制裁將迫使日本投入德義和蘇聯的懷抱中，在太平洋上採取積極的排美政策。（美國之喜歡日本的「溫和派」這就是原因之一，而日本也看中美國這一點，所以常美日問題成爲日本外交工作的重心時，他們便抬出野村和米內這些與美國有密切關係的人物來。）單禁運一項問題所牽涉的範圍，已可以看出美國遠東政策的繁複紛亂的程度。

在這種情形下，美國對日態度當然是難於積極的。讓我們用本年的事實作例：二月，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否決了對日實施制裁的提案；二月十六日衆議院又以一二四票對一一三票刪去關島設防案。甚至五月杜少格少將的日美戰爭不能避免的演辭，也引起強烈的反對和惡評。但另一方面，牠又通過大海軍的建設，（主要目的是在對付日本）和太平洋海軍的演習。汪精衛偽中央政權成立之後，美國國務院也有了明確的表示。（美國一向是不吝嗇這樣的宣言與表示的。）如果我們說，美國的遠東政策是積極的，這話大體上是對的，但如果我們說，美國的遠東政策是反日的，那麼這話有一半是錯了。這就是說，美國遠東政策的積極成份，並非完全是反日的，她還有其他的內容。讓我們再敘述蘇美與中美的關係，那麼結論就會十分清楚地露現。

蘇美間的矛盾似乎用不着說明。兩個體系的敵對正決定了蘇美的矛盾。但有些時候，譬如說，一九三一年以後，日本在華侵略對美國的威脅增大，而英國又拒不與美國合作時，美國在絕望之餘，不能不向莫斯科招手，（一九三三年）以增強牠在遠東的發言

地位。這種和平的國交，直到去年歐戰爆發，紅軍開入波蘭之後，就完全動搖了。原因是一方面美國的反蘇宣傳家已覓得了一種藉口，另一方面則因為資本主義危急的深刻與兩個體系的敵對程度，已日見加深。蘇芬戰事爆發後，美國的反蘇運動，在反動份子胡佛（華爾街的忠僕）的倡導，和羅斯福的策勵與扶助之下，已達到了前此未有的規模。美國的反動資產階級不唯企圖策動一個大規模的國際反蘇十字軍，而且還希圖借這機會，加強他的國內統治，使他走上完全法西化的戰爭的道路上去。這種態度表現在遠東政策上，就是一方面消極用壓力阻止日蘇關係的改善，積極挑撥蘇日的衝突。對日不實施禁運的原因之一，就是以這作為增強日美關係的手段。紐約時報曾說：「日本再也不能充作亞洲反共產主義的先鋒了，對於她，我們還有理由源源她拿殺人武器接濟牠，叫她去殺害我們的天然的朋友中國嗎！」（見上海時代半月刊創刊號譯文。）由此，我們便可以看出美國的接濟日本，原是含有雙重的意義的。另一方面，則為削弱蘇聯對華的影響。（中國雖然獲得蘇聯巨大援助，但始終採取着疏離蘇聯的態度，甚至蘇聯援華的具

體內容，到現在都沒有明確的報告，其原因就在此。關於這一點，最近由華返美的著名經濟學家巴勃遜，就有坦白的說明。在他所規定的美國五項任務中，其第二項即為「阻止蘇聯在華伸張共產主義，以為援助中國抗日自衛的代價。」（註十一）

現時美國也有一部份主張美蘇關係不應惡化，俾日本不致以聯蘇為威脅。這種主張可以用斯諾（一是堅強的反蘇論者）的論調為代表。他說（註十二）

「華盛頓也許恐怕日蘇的接近，將影響牠在西太平洋上的地位，爲着打消此種影響起見，美國說不定會採取積極的手段……美國實際並沒有與蘇聯翻臉的必要。美蘇兩國現在都在支持重慶政府，同時，美國對中蘇領土也毫無野心，因此美國應認清這些事實，而與蘇聯訂結特別協定。這對美國是非常有利的。

「這一點與美國人的討厭斯大林，毫無關係。在太平洋範圍的，美蘇之親善協定，很有使

（註十一）申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九日上海英文大美晚報。

（註十二）見一九四〇年四月的 *Foreign Affairs*。

速東安定的效果。這種協定比之蘇聯和別國的別種條約，未必具有驚人的永久的價值，但其外交上的有用性，是很足驚人的，只要這種會商一旦開始，日本的擴張主義者馬上就會閉口，而且馬上派遣特使到華盛頓來商量。」

斯諾的意思是勸告美國不要太過固執，最好是維持高度的外交的融通性，因為「世界現在正以流線型的速率向大變動推進中」，而且與蘇聯的協定橫豎沒有「永久的價值」，隨時都可以拋棄。他之所謂「親善」，其實際意義是等於「利用」，利用這協定作為一種手段，以迫使日本聽從華盛頓的條件而已。因此，他的主要目的是在對日，而非在蘇聯，等到日本聽命之後，日美的共同對象顯然就是中國和蘇聯，但這是斯諾等所不願意公開說明的。

這種主張，在西線戰事日臻惡化的時候，顯然更有被採用的可能。但就我們所知，美國現在似乎寧願與日妥協，而不願與蘇接近。最近華盛頓的若干措置（如援助芬蘭，對蘇道德禁運，白林海峽海軍根據地的設防，與阿拉斯加駐軍的增加等）都公然採取反

蘇的姿勢。退一步說，即使美蘇接近了，美國也決不會放棄其反蘇的基本政策，尤其不會放棄阻止日蘇與中蘇接近的政策。美國合衆社編輯之一，即被稱爲近東問題權威的烏恩（Miles Vaughn）最近曾說（註十三）

『自然，倫敦和華盛頓都十分明白日本的問題。他們都願意阻止日本在華的收穫。但他們同時又不願意目下比較溫和的日本內閣，被極端派的軍人踢出去，另代以親德的內閣，而使日本加入歐戰。』

因此，在某一限度之內，華盛頓當局就不能不對日本讓步，使所謂「溫和派」的頭能繼續冒出水面，以減少蘇日接近的機會。

現在我們再看看美國對華的政策。一般說來，中美在對日的關係上是利益一致的。美國許多人都說中國爲美國而戰，美國阻止日本擴張的政策，對中國的抗戰顯然也屬有利。但如果我們因此而得到「中美利益從同，步驟與目標一致」的結論，那是錯誤的。

（註十三）見一九四〇年一月美國 Current History。

當我們考慮中美的關係時，我們不能不把美國上述的各種顧忌計算上去。

美國對華的政策，猶如牠對日對蘇的政策一樣，包含着許多矛盾。要說明這一點，我們必須闡明美國對華的基本政策。

美國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這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應當記住的。當一九二七年北伐軍攻陷南京時，幫助孫傳芳開砲轟擊革命軍的，就是下關的美國兵艦。這事實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美國對華的基本態度。就最近四十年來華盛頓的對華政策而言，牠主張金融的干涉，而斥責軍事的干涉，牠主張維持中國土地行政的完整，而反對侵佔與勢力範圍的劃分，換句話說，牠主張保持中國的半殖民地地位，使之成為列強共有的利益均沾的公開市場，這就是九國公約所標榜的原則。美國之採取這一政策，是因為當牠的勢力到達近東的時候，中國實際上已為英法日等列強所劃分，牠那強大的金融資本勢力，在華簡直沒有插足的餘地，同時美國所迫切需要的，並非中國的領土，而是中國的市場。更兼美帝國主義者，還企圖在中國維持一種權力均勢，即抑壓日本，扶持中國，以保全其

領導者的威信和地位。爲着鞏固這一地位，牠首先退還庚子賠款，此外，每年還毫不吝嗇地提出數百萬美金，以「散播道德與文化的種子。」美國教士與傳教家，「在近東傳播着美國生活和美國思想中的和平精神，比任何國家爲努力。」（註十四）這就是美國遠東政策看起來是那麼「正義」和「反侵略」的原因，也正是中國要人們近年來的親美傾向的根源。

實際上，金融的干涉跟軍事的干涉是一樣的罪惡，而經濟的滲透，在某一點上，比軍事的佔領，更難使一個半殖民地國家得到翻身的日子。我們決不能跟着國內那些親美老爺們一樣，盲目信賴着美國的領導。（註十五）因爲接受這「誠懇的領導」的結果，中國決不是一個獨立而自主的國家，至多不外是菲律賓與巴西的前途。

（註十四）見上引史汀生改訂約案照土報公開信。

（註十五）上海中美日報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社評中，曾說「最好的辦法，還是讓中國接受美國誠懇的領導。」這樣的話，我們從要人們的談話中，已聽過了許多次。

美國的帝國主義的臉孔，在九國公約中已完全呈露出來。九國公約連國聯盟約的空架子（即各國一律平等）也沒有。牠並不把中國當作一個與其他八國平等的國家。這公約實際上是列強組織侵華的聯合戰線的約定，並用以保證中國的統一完整與半殖民地化，共同強迫中國履行牠對列強所擔負的條約義務。牠規定其他八國有共同剝削共同掠奪中國的自由，所反對的，是任何列強對中國的獨佔。

美國現在的遠東政策，還是根據着這一立場，但時勢的變遷，已使美國單只強調「門戶開放」與「機會均等」而忘却了「尊重中國領土與主權的完整」。這就是說，美國所記住的，已不是「道義的假面具」，而是牠本身在華的利益。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九日美國駐日的格魯大使，曾發表一次聞名的演說，重慶方面對這演辭極為感激讚賞。但我們如加以小心的分析，便可以看出格魯大使所強調的是如下幾點：第一，日本在華的軍事行動，破壞了美國的利益；並在「東亞新秩序」中，剝奪了美國人在華長期經營獲得的權利；第二，日本竭力在亞洲大陸的廣大區域中，建立統治，並在那里樹立一種經

濟封鎖的制度；第三美國認為現行遠東趨向如果繼續下去，必將使他們所切盼的新秩序的世界，毫無發展的希望。這些是美國人所最憤激的事情。格魯大使在演辭中，並沒有說到『日本軍隊今天在中國所做的』其他的『事情』，因為美國對於這些並不憤激。

格魯大使的演說，在暴露日本侵略對美國的損害一點，可謂淋漓盡致。站在美國的立場上，這是應當讚賞的，站在利用美日矛盾以運用我們的外交政策的立場上，這也是值得注意的。然而我們却不能說這演講是正義的呼聲。中國的民族利益和他所受的痛苦，格魯毫無一字提及。重慶一家報紙說格魯的演說是一盞明燈，假如牠真是明燈，那麼牠的光亮只照向西向而不照到東方。

這里之所以特別提出格魯的演說，是用來證明美國遠東政策的基本原則，一直到現在還沒有變化。老實說，只要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存在一天，這自私的掠奪殖民地的政策，就決不會改變。譬如美國到現在曾以四千五百萬美元借給中國，但美國主義者計算得非常精明，務使在幫助中國時，使中國的經濟越發倚賴美國。他決不會在這『援

助」中失去一個銅板，反而從戰爭的高物價中獲得巨大的利潤。他的吸收中國白銀，是在促使中國越發投入美國懷中。而當購買白銀已對美不利時，牠就停止購買了。在理論上，美國固然願意支持中國的抗戰，以削弱日本的力量，同時不管怎樣自私，也總算給了中國一點幫助。但牠的援助決不能超過某一限度，致使中國的抗戰獲得最後的勝利。同樣，美國對日本的壓迫，也決不能超過某種限度，致使日本帝國主義陷於崩潰的境地。日本的失敗和發生革命，必然使世界的革命勢力劇增，而中國抗戰的勝利，則象徵落後的東方的覺醒，和殖民地制度的推翻，這對於資本主義體系也是一個致命的打擊。這就是美國遠東政策的主要的矛盾，老實說，美國對日本的失敗，比對中國的失敗，實際上還要更加關心操切。

只有根據這一觀點，我們才能說明美國援助芬蘭比援助中國熱烈的原因。蘇芬戰爭爆發的第一天，羅斯福就嚴辭斥責蘇聯，第二天，就禁運飛機赴蘇，第四天就召開駐比（前駐蘇聯）的大使台維斯，會商對蘇方策，第十天，就宣佈由進出口銀行建設金融公

可開立信用貸款一千萬元貸予芬蘭。同時，美國輿論界更推波助瀾，痛斥蘇聯的侵略。前總統胡佛，也立刻發起所謂「救濟芬蘭」的募捐。這些事情，美國作家特萊塞曾有非常嚴厲的揭發，在牠發表於新羣衆周刊上的一封公開信中，他說（註十六）

「假如美國在一九三七和三八年救援了在西牙班被炸和挨餓的民主主義的西班牙人的話，現在來救援芬蘭人，當然是很對的。但是胡佛先生當時爲什麼不開口呢？那時美國想救濟西班牙人沒有墨索里尼在一九三四和三五年間，屠殺了許多阿比西尼亞人，那時美國爲何不救濟呢？美國爲何不送錢和食糧給他們呢？中國的男女老幼，自一九三三年以來，就天天被日本人屠殺，美國救濟了什麼呢？我一點也沒有聽到說過。相反地，我們還在以軍火接濟日本——並非中國——而且居然沒有什麼宣傳來反對這件事！」

就是這個胡佛，一九二七年八一三後，美國同情中國的人，會希望他出來領導捐款，救濟中國數百萬難民，而他竟辭謝不遑，現在則到處呼號，惟恐不及。（註十七）假如說美國

（註十六）原文見一九四〇年一月三十日美國新羣衆，此係抄錄世界智識譯文。

援助芬蘭是爲着「反侵略」，那麼爲什麼厚於芬蘭而薄於中國呢？中日戰爭爆發後，羅斯福的第一道命令是撤退所有在華僑民，「如有違令，政府概不負責」。抗戰達一年半之後，美國才給予二千五百萬美金的借款，二年之後，才宣佈對日實施道德禁運。以這和最近對芬的援助比照起來，我們就可以明白美國對中國抗戰的態度了。

以上的敘述大體已說明了美國遠東政策的各個方面。由此，我們的結論是非常明顯的。美國所有這些矛盾的傾向，使牠不能不採取如下的基本政策，即在削弱中日兩方的基礎上，來調解已進行了三年的中日戰爭。

美國是不願日本或中國勝利的，牠所希望的是支配交戰國雙方，使牠佔居太平洋主人的地位。蘇聯遠東問題權威莫濟列夫(S. Mozylev)在論述美國的太平洋政策時，曾得到如下的結論：(註十八)

「首先，美國帝國主義者是由中日戰爭來賺錢的。其次，這並不是較不重要的要點，他們

(註十七) 看本年二月十八日上海大美報所轉載的李國欽紐約通訊。

正從交戰國雙方收吸了大批的金銀，這樣，在美國資本家看來，兩方就都日甚一日地倚賴美國，直到交戰國雙方精疲力竭，美國主義者就希望在適當時期內，把「不干涉政策」改為直接的干涉政策，進而強迫中日兩方息戰和平。不用說，所謂和平，是完全依照美國在遠東的帝國主義利益的。」

美國主義者這項計劃，是籌謀得非常周密精到的。在這種和平機會實現的時候，美國可以用借款或原料的供給等保證，來作為日本撤出在華駐軍（當然長城以北是應該歸給日本的，爲着進攻蘇聯，中國必須忍受此項損失）的交換條件。日本現在的經濟機構已瀕於崩潰，美國的借款可以幫牠逃出這難關，而牠所吐出來的，則因爲美國有着巨大的資力，當然可以勝任地吞嚥下去。至於中國呢，美國也可以用同樣的手段加以全般的支配，以投資和奪取市場來進行全般的掠奪和剝削，使他的地位更加倚賴美國，而奠定了牠的永遠爲美國所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地位。

（註十八）見上海出版的時代翻譯半月刊創刊號譯文。

這就是美帝國主義者的野心，在這種政策的播弄之下，中國的抗戰，真是爲着美國的資本家而戰了，中國抵抗暴敵的結果，就是換了一個主人——由日本的奴隸變成美國的奴隸。

美國這種企圖能否實現呢？這裏有三個因素是必須考慮的：

第一：如果中國的民衆堅決抗戰，美國這種企圖就沒有實現的可能。中國的要人們多半倒是願意依照美國的條件與日本講和的。在去年太平洋會議上，中國的代表已公然表示，只要能恢復七七以前的原狀，中國很願意講和。老實說，國內所有的親美派都抱着這種見解。因爲他們所顧慮的，也跟美國統治者一樣多，第一害怕蘇聯勢力的強大，第二害怕人民羣衆的興起，第三害怕帝國主義勢力退出遠東，使他們失去了政權的支持者。但今日中國的民衆，已不是五年十年以前的中國人民大眾了。抗戰烽火鍛鍊，使四億萬五千萬人的眼睛，都望向民族自由解放的目標。任何一部份人，如果想把中國出賣給美國，牠必然要受到汪精衛今日所受的打擊。出賣給日本跟出賣給美國，都是漢

知，其背叛民族利益是相同的。

有許多人以為美國的調停，總比中國直接與日本講和來得好。說這樣的話的人，根本已確認中國沒有勝利的可能。今日在國內破壞民族統一戰線，製造國共磨擦，剝奪民主自由的人，顯然只有接受美國的領導這一前途。老實說，這是他們唯一的而且是最好的前途，假如他們不改變這一政策的話，他們開口美國，閉口美國，把羅斯福捧作天神，把美國的禁運和海軍調動竭力加以誇大，這正是他們接受美國領導的輿論準備。每一個中國人對這些宣傳和欺騙是應當警覺的。

第二，如果日本不願意答應美國的要求，美國這種企圖也沒有實現的可能。要日本退出華南和長江以南一帶，那是頗難想像的事情。日本雖然深陷中國事變的泥沼，但牠依然要保持戰勝者的身份。退出日佔領區是否將導起內部的革命，文是一個頗為嚴重的問題。日本軍閥對這一點是決不能馬虎將事的。自然，美國的條件可能修改，但日軍的必須退出一部份佔領地，乃是美國必然的要求，否則不唯難以說服中國，而且牠本

身的利益，也就得不到保障了。

第三：如果美國民衆堅決反對政府這種行動，美國這種企圖也一樣沒有實現的可能。美國現在一切的罪惡行爲，都是完全違反民意的。史汀生曾說：『從報紙的輿論，以及民意測驗的結果看來，美國人民對於日本侵略，其意見的一致，是以前對任何國際問題所沒有的。遠東糾紛剛一開始的時候，美國人民就存了正確的判斷，就竭力反對日本，反對日本的侵略的不義和牠的野蠻手段。』下面民意測驗的結果就是一個實例：

一九三八年二月贊成美國應當運軍火彈藥到中國的，佔百分之三十六，一九三九年六月增至百分之六十。一九四〇年二月增至百分之七十五。

一九三九年六月，贊成禁運軍火赴日的，佔百分之七十二；一九三九年八月，增至百分之八十二。同時贊成廢止美日商約的，佔百分之八十一。（註十九）據李國欽紐約通信（二月二十五日）中所引，美國民意測驗社報告中曾說，贊成禁止軍火赴日的選民中，有十分之七甚至主張即使禁運之後，兩國關係發生紛擾，也在所不惜。因此，我們可以看

出羅斯福已成爲金融資本家的傀儡，他的主張是違反絕大多數的美國民意的。

由此看來，美國民衆援華制日的傾向是異常明顯的。如果美國政府敢違反民意，出面調停中日戰爭，以致損害中國的利益，那麼美國民衆必然會加以反對，而且可能引起嚴重的政治糾紛，因爲羅斯福統治的基礎，本已相當薄弱。這一點美國政府也是不能不加考慮的。

總之，只要中國能堅決抗戰——中國民衆當然是堅決抗戰的——美國的調停企圖，必然歸於破滅。覺醒的中國民衆是一個巨大的力量，中國此刻已不是列強隨便擺佈的賭注。牠的經濟基礎雖然薄弱，但牠還有一個忠實可靠的友邦蘇聯。不要說國外列強要擺佈中國的命運已不可能，就是中國要人們如果決定走華盛頓路線的話，牠也要在民衆瘋狂的反對中淹沒埋下去。

（註十九）上列數字見美國 Amerasia 一九四〇年二月號至一九四〇年二月之數字，則見上海新報

氏評論報一九四〇年二月十四日。

中國的堅決抗戰，不僅足以擊碎美帝國主義者犧牲中國和支配中國的企圖，而且還能促使日美矛盾的加增。不論從任何角度觀察，中國抗戰的條件是越來越有利的，如果我們能堅持，能動員廣大民衆，能採取革命的外交政策的話。

四 中國對美政策的批評

現在，讓我們再看一看中國對美的政策。

我們相信，不論是誰，只要牠的感覺不很遲鈍，他一定可以在每天的新聞紙上，嗅到一股非常濃厚的親美氣味。歌誦美國，已成爲一種時髦的傾向，沒有一次廣播，會短缺「感謝民主的美國」與「希望反侵略的美國」的呼聲。羅斯福的一次演講，簡直比前線的勝利，更使要人們興奮，他們本來是只能從美國得到「勉勵」的。新聞和輿論故意曲解或誇張美國的動向。究竟美國已禁運了什麼呢？他們這樂觀具賤價的！在美日商約廢止而又沒有失效以前，他們預言美國六個月後就會禁運，六個月後，不唯沒有禁運，輸美的日

貨也一樣受到特惠的待遇，於是他們便說，這是美國對日實施「緩刑」——中美日報所說——不久馬上就會禁運的。現在又六個月過去了，「緩刑」似乎還沒有滿期，甚至竟有提早取保赦放的模樣！這是什麼道理呢？我們的輿論把我們帶到那里去了？要人們對禁運的關心，比對動員民衆還來得起硬，好像只要美國一禁運，中國便用不着打仗似的。

正如汪精衛有親日和歌誦日本天皇的自由一樣，李精衛也一樣有親美和歌誦羅斯福的自由。但如果李精衛們以這作爲中國的外交路線，從而危害了中華民族的利益的話，我們老百姓便不能緘默了。

無論如何，親美的傾向，已把美國的帝國主義的本質弄得異常模糊，甚至把太平洋對岸的帝國主義國家，當作中國的救主。許多人對戰前的內戰念念不忘，但對美國的砲轟北伐軍等帝國主義行動却已淡然若忘。中美日報對九國公約的解釋實在是驚人的！牠說：

「九國公約兩大原則（一）中國之主權，獨立，管領土與行政的完整；（二）中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已由中國的抗戰建國而使日本無法掃除。第一原則所揭櫫者乃中國立足大地上之最低條件，中華民族即戰至最後一彈一卒，亦必加以維護。第二原則的保持，則爲舉世各國對中國往來之必需條件。即至弱小的國家，也必出而力爭……九國公約締立時，遵原則遂有更確定的意義與範圍，而爲安定遠東局勢的基石……其實，維持中國主權獨立，管領土行政的完整，和開放中國門戶，俾他們得享均等的機會，乃是中華民族本身應盡的責任。」

（註二十）

中美日報假如不是幫着美帝國主義來欺騙中國民衆，那麼他是以奴隸的鎖鏈當作光榮的標幟了。九國公約這兩項原則，根本就是互相矛盾的。既然承認中國的主權和獨立的完整，爲什麼又要強迫中國開放門戶呢？美國爲什麼不開放門戶，不保證中國和其他的小國家在美機會均等呢？美國和其他七國，爲什麼不規定「美國全國鐵路，不施行或許可何種待遇不公之區別。例如運貨及各種便利，概無直接間接的區別，不論搭客

隸何國籍，自何國來，向何國去；不論貨物出自何國，屬諸何人，自何國來，向何國去；不論船

（註二十）見本年二月十三日中美日報社評。

船或他種載運搭客及貨物之方法，在未上中國鐵路之先，或已上中國鐵路之後，隸何國籍，屬諸何人？呢？顯然，美國和其他七國都不承認中國是與他們處於平等地位的國家，他們可以剝奪中國關稅的主權與鐵道的主權，他們可以剝奪中國保護民族工業的任何手段。這些顯然危害了中國的獨立，掠奪了中國的主權。條約上所說「尊重主權，獨立……之完整」云云，假如不是一種客氣的點綴，就是形而上學的東西。然而中美日報却說這是「與舉世各國往來之必具條件」，究竟除開中國之外，世界上還有那一個國家以這樣的「必具條件」與各國往來的？中美還進一步說到這原則是「安定遠東局勢的柱石」，是「中國本身應盡的責任」。這論調使人聯想到奴隸的鐐扣的叮嚀的響聲。其實，即使要爭取美國的援助，也用不着這樣奴顏婢膝的。

在另一篇題為美遠東政策的歷史光芒中（註廿一）牠把第一次歐戰前美國私自出

賣中國利益給予日本的藍辛石井協定，作了更昏狂的辯護。他說「當時美國之屬於日

（註二十一）見本年二月二十九日中美社論。

本有所協定者，是因為美國要使中國參加歐戰，俾免日本將來魚肉中國，但因「美國初加入歐戰，一時未便與日本遠東方面有所齟齬。爲謀使中國獲得最大利益而小作讓步，計乃有藍辛石井協定的成立。」爲什麼當時美國自爲中國主人，不做得中國的同意而私自承認日本在滿蒙一帶有特殊的權益呢？中美並不加以說明。據我們所知，藍辛石井協定完全是一種賄賂，跟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英日密約一樣，而且美國之訂立這一密約，也含有打消英日密約的企圖。然而在中美日報筆下，中國倒應該感謝美國了！因爲牠的動機完全爲着中國的利益，使日本在和會上不致處分中國！他們的結論是非常堂皇的：

「總之，我們對於美國的道義心，正義感，可歷久而益與信任……藍辛石井協定，在美國遠東外交史上，只是一個瑕疵。除此之外，美國對華，真可說一片光明，一片誠意……中國之信

仰美國，實四十年來歷史體認之結果，這是中國人人所共喻的。」

帝國主義者的猙獰面孔，在這里是完全加以美化了。中美日報的目的，是在說服中國人，叫每個中國人信任美國，因為「美國對華，真可說是一片光明，一片誠意。」即使美國現在以軍火供給日本，也無庸加以懷疑，因為這是他們「四十年來體認的結果」呵！中美日報之所以一再誇讚美國，並不是毫無目的的。這是一種輿論的準備，俾中國老百姓們以後可以服服貼貼地一任「美國的領導。」當王寵惠對美聯社記者馬立斯發表一篇高談和平期望美國的領導的談話之後，中美立刻加以反應，其社評題目爲展望美國的領導，其中最精彩的二節是這樣的：（註二十二）

「對遠秩序的擾亂者，和國外的條約的破壞者，予以懲戒和打擊，站在最前線的，自然是中國本身。而以理想主義，道義責任，來支持中國的正氣和實力的，則要推到美國。這一個論點，是可以堅定樹立，絕不動搖的。另一個論點，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美國不僅已穩穩地成爲太平洋方面的盟主，即在歐洲局面的平衡上，美國也早已成爲一個重要的砝碼。我們

敢大胆地說一句，只要美國堅定不移，歐洲的其他民主國家，如英國、法國，必也不敢不馬首是

（註二十二）見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中美日報社評。

瞻，來盡其光明的道德的責任的……

總之，即使歐戰擴大，中國抗戰之局，也決不因之改變。英國或蘇聯（！）或者難免要以調處中日爭爲手段，而吸引中日兩國同走上自己的軌道。其實還是徒然的。在中國屈居劣下地位，而勉強被拉入「和平」的局面之下，則遠東只有爲歐洲戰局之累。最好的辦法，還是讓中國接受美國誠懇的領導，一面完成抗戰建國的巨業，一面以其餘力在歐洲戰爭中，爲民主國作誠懇的服務。」

似乎用不着再加闡釋，這二段文字，已充分表明了他們對美國的認識和希望。我想每個讀者都明白，一個正在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家，竟希望另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來加以領導，牠會得到什麼樣的前途呢？老實說，這些人並沒有堅持抗戰到底和收復全部失土的決心，他們對中國自身的力量也缺乏信任，因此其唯一的辦法就只有倚賴另一個帝國主義者，在牠的「仁慈的照顧」和「誠懇的領導」之下，把中國帶回半殖民地。

的地位去，而讓所有的國家，繼續享受開放與均沾的利益。中美這種企圖，與其說是代中華民族着想，無如說是代帝國主義列強和中國那些靠列強的撐腰而強迫中國民衆去接受領導的那些人着想。你看他們正想進一步，以其餘力，爲民主國家作誠懇的服務！呢！多應卑順的僱傭呵！

筆者之所以引用中美日報的意見，完全是因爲牠代表中國目下最有勢力的人們之見解。假如我們要了解中國對美的政策，中美的社評就是一面明鏡。在今日中國的輿論界中，我覺得中美因爲採取第三者的立場，所以最敢坦白說話。如果我們在中美日報中看到的中國對美的政策，那麼她實際就是中國目下對美的政策。

無論如何，中國對美的政策，決不是一種革命的外交政策，牠不能利用美日的矛盾，以增強中國的抗戰，反而被美國用作爲與日本討價還價的工具。就中華民族的利益看來，聽任中國的命運握在美國帝國主義手中，實在是一件最可悲的事！在這里我們必須指出的，是任何半殖民地的政府，如果不倚靠本國革命的羣衆運動，那麼，牠的外

交政策，決不能是獨立自主的，只能成爲服侍帝國主義利益的工具，成爲帝國主義勢力的附庸。中國目前如不能更積極地展開有組織的大規模的羣衆運動，和堅持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作爲抗戰的和對外政策的根據，那麼抗戰就只有一個前途，不是直接對日投降，就是任其他的帝國主義國家出面領導，加以結束。無論如何，這決不是勝利的前途，獲得勝利的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蹂躪中國已數十年或一百年的野蠻的列強！

讓我重複說一句：中國應該利用美日的矛盾，爭取美國對華的援助，目下美日的矛盾仍然日甚一日，特別是英國對日妥協之後，這矛盾更加尖銳，將來美國是可能採取各種制裁或壓迫日本的手段。美國的政策雖然自私，但他畢竟不是英國，任何有害於日本的舉動就都有利於中國的抗戰，美國是太平洋一個強國，如果牠與日本的矛盾一天不解消，那麼中國就一天可以而且應該爭取和獲得牠的幫助，更應該爭取美國民衆——中國真實的友人——的援助，但決不是聽任美國領導，牠只會把中國領進華爾街金融資本家的保險箱里去！

第三章 三年來蘇聯的遠東政策

一 蘇聯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

一國的外交政策，是牠的國內政策的繼續。蘇聯的外交政策，跟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外交政策是完全不同的。本來，任何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都是階級的政策，牠的任何一種外交行動，都是階級的行動。美國和英法德義日等帝國主義國家的外交政策，猶如他們的國內政策一樣，完全爲金融資產階級等少數人服務，以保護和發展這少數人的利益爲其目標，但蘇聯的恰恰與這相反，牠的外交政策，牠的任何一種外交行動，都是由無產階級及其同盟者的利益出發的。

一國的外交政策的方式，時常因國際形勢的變動而變動，也時常因地域的不同而

變化。美國在美洲採取門羅主義的政策，以獨佔美洲爲目標，在歐洲則採取「中立」的政策，以進行間接的干涉；而在亞洲所採取的政策，則與在美洲的完全相反，牠反對日本的東亞門羅主義（也卽所謂「東亞新秩序」），反對英法的劃分在華勢力範圍，而要求開放中國門戶，在華機會均等。英國在歐洲大陸進行所謂反侵略戰爭，但在地中海則與法西斯意大利妥協，在太平洋則與侵略的日本攜手；牠對自治領的態度是優容的，對印度與巴力斯坦的態度是高壓的。英美政策這種種變化，都是適應牠整個的最高的目標——華爾街與倫敦城的金融資本家的利益。蘇聯外交政策的方式也時有變化。在此次歐戰爆發之前，牠在歐洲的外交目標是建立一個反侵略的集體安全同盟；由於英法的陰謀和反動，終致戰爭爆發，於是他便採取中立的政策。牠的任何一次行動，都堅決地依循着牠那基本的目標：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戰爭，援助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維持和平和保護蘇聯。牠這個目標與蘇聯人民的和全世界的勞働大眾的利益，都是完全一致的。

要認識蘇聯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必須了解蘇聯是處於資本主義的包圍狀態中。至少，除非是某些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階級奪得了政權而粉碎了這種包圍，否則蘇聯整個的外交政策，就不能不以這種包圍和由於這種包圍而引起的危險爲其唯一的根據。

蘇聯和無產階級的革命領袖列寧，最初指出了這一事實，他說：

「我們不僅是生活在一個國家裏，而且是生活在一系列的國家之中，如果說蘇維埃政府能够在長時期內與各帝國主義國家繼續共存，這是不能想像的。終極兩個終有一個要被征服。同時在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難免要發生許多激烈的衝突。這就是說，如果作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要而且繼續要統治下去的話，牠還須以軍事組織來表明這一點。」

斯大林在列寧主義問題中，也有類似的警告。此外，他又在給伊凡諾夫的信中，明白地指出了這一點：

「我們能够把社會主義在我國的勝利當作最後的勝利嗎？也就是說當作一切軍事進

攻的危險和恢復資本主義的企圖都被解除，而假定社會主義僅在一國勝利和資本主義的包圍繼續存在嗎？

『列寧主義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列寧主義這樣指示：「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只有在一種國際規模之下才有可能。」（請看共產黨第十四屆大會的決定）

『這就是說，國際無產階級的巨大援助，是一種力量，沒有他，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最後勝利這問題，是無法解決的。

『自然，這決不是說，我們應當坐着又起手來，等待國外的援助。

『我國全體民衆在軍事進攻威脅之下，應當不斷地處於動員的和準備的狀態中，這樣我們外面的敵人的「意外事件」和陰謀，才不會於突然間進襲了我們。』

在兩個體系互相敵對的情形之下，蘇聯的外交政策當然是直接去削弱這種包圍。削弱資本主義包圍的方法，主要是如下兩種：首先是利用資本主義陣營內部的，和各敵對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其次，就是由一方面改良他本身的弱點，由另一方面肅

清各種現實的和可能的危險的根源，以加強牠本身的戰略地位。

關於利用包圍蘇聯的各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一點，列甯在論布勒斯托—里托夫斯克條約時，曾這樣說：

「這條約的結果，看起來也許像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與德國帝國主義之間爲對抗另一個帝國主義而給合的集團之類。但我們可不參加任何集團：我們是利用兩個帝國主義之間的敵對，使兩方面結果都落空……但當我們強大到足以擊毀整個的資本主義時，我們將扭住牠的頸子……」

遠在一九三四年二月，斯大林在蘇聯共產黨第十七次全體大會的報告中，也曾這樣說過：

「我們一向從未傾向德國，也從未傾向波蘭與法蘭西。我們過去的傾向和現在的傾向是趨於蘇聯，而且只趨於蘇聯。如果蘇聯的利益要求與這一個或那一個無意擾亂和平的國家接近時，我們將毫不躊躇地採取此項步驟。」

同樣，莫洛托夫在論及蘇德互不侵犯協定時，也說到：

「蘇德在不侵犯協定的目的，難道真的是難以理解的嗎？憑此項條約，蘇聯即不應袒英以反德，也不應該袒德以反英，難道這是難以理解的嗎？蘇聯正奉行而且將繼續舉行其自己的獨立政策，以蘇聯人民的利益爲唯一依歸，難道這真的是難以理解的嗎？」

上面所引各節，已非常明晰地說明了蘇聯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假如資本主義的包圍存在一天，蘇聯定然繼續採取是項政策。斯大林在蘇聯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中的報告，更把這基本原則具體化，引伸爲如下四點：

「第一，我們堅持和平，堅持與一切國度發生事業的聯繫；我們堅持着的且將繼續堅持着這樣的立場，如果這些國家對於蘇聯也保持同樣的態度，如果牠們不企圖破壞我們的利益。

「第二，對於與蘇聯有共同國境的一切鄰邦，我們堅持和平的，親近的，和善鄰的關係。我們堅持着而且將繼續堅持着這樣的立場，如果這些國家對蘇聯也保持同樣的態度，如果牠

們不企圖直接地或間接地破壞蘇聯國境的完整和神聖不可侵犯的利益。

「第三，我們堅持援助一切被侵略者所侵略，及爲他們自己祖國的獨立而鬥爭的國家。

「第四，我們不怕侵略者的恐嚇，而且對於企圖破壞蘇聯國境的神聖不可侵犯的那些戰爭挑釁者，準備以雙倍的打擊回答他們的打擊。

「這就是蘇聯的外交政策。」

蘇聯的遠東政策，就是根據着這四項原則出發的。世上再沒有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像斯大林所說的那樣明白、切實和肯定，也沒有一個國家在執行其對外政策時，能夠像蘇聯一樣切實堅決，言行相符而毫不動搖。三年來蘇聯在遠東（在世界的其他部份也是一樣）的無數大小的外交行動，都證實蘇聯當局始終一貫地切實運行着牠所宣佈的政策。但中國輿論界的那些老爺們，一向却宣說蘇聯的外交政策是一個「謎」，所以成爲「謎」的原因，就是因爲牠「沒有固定的原則，不惜因時勢的變易而翻雲覆雨。」這是惡意的誣蔑和歪曲。讓我們用三年來的事實來拆穿這惡毒的誣蔑吧！

二 一三年來蘇聯對日的政策

蘇聯的人民和政府，一早就曉得日本是包圍蘇聯的資本主義鎖鏈中的強大的一環。在一九一八年上半年，英、法、日、美等帝國主義不經宣戰就開始對蘇俄的軍事干涉。日本的侵略遠征軍在海參崴登陸，佔領了濱海省，驅逐了蘇維埃和幫助白黨的叛變，以後又恢復了資產階級的制度。日本帝國主義者企圖利用這干涉的機會，把中國的東北和廣大的西伯利亞併入牠的帝國的版圖。然而在蘇俄革命軍民的衝掃之下，建立『西伯利亞新秩序』的戰爭冒險家，終於滾出了蘇聯的領土。

日本的軍事干涉雖然完全失敗了，但日本軍閥侵略蘇聯的企圖却始終沒有放棄。他的雙眼不轉睛地望着廣闊而豐饒的西伯利亞。蘇聯的人民和政府對日本這野心是雪亮的。自一九一九年之後，這兩國的關係一直處於對立的狀態。日本的軍事冒險家拼命高喊：『日蘇的對立是宿命的！』

日本的侵略東北三省，自有它帝國主義的本身目的，但還裝着反蘇的姿勢。隨後，世界上三個「反共」國家，又組成了一個集團。這更顯出他們的真正目的，與其說是反蘇，勿如說是對英、美、法等國家的敲詐勒索，而面的在不很損害他們的主要利益的情形下，也答應給他們一些「定錢」。於是德國獲得了奧地利和捷克，義大利分到了阿比西尼亞與阿爾比尼亞，而遠東的日本，除佔奪東北四省之外，又於一九三七年了開始更大的侵華掠奪戰爭。

正如我們在第一章中所說，日本在開始侵入華北時，也是以反蘇的姿勢出現的。牠在滿蘇邊境，駐紮了數十萬的大軍，另一方面，又派出精銳部隊向綏察內蒙推進。牠根據一九三一年時的教訓，相信英、美、法等在華有重大利益的帝國主義國家，必能採取「中立」和「不干涉」的政策，甚至或有加以積極援助的可能。在這種情形下，蘇聯決不能閉着眼睛，熱視無睹。牠除一面繼續秉持和平政策之外，又積極增強邊防與紅海陸空軍的戰鬥力。自此之後，蘇日兩國間的關係，已漸漸進入了自一九一八年以後所未有的緊

張狀態。

蘇聯深知國際上反蘇陣營的巨頭們的企圖，躲在日本背後，慫恿牠開始反蘇的「聖戰」。如果在中國他們之間沒有利害衝突，是巴望犧牲中國，把中日兩國間的戰爭轉化為日蘇間的戰爭的。蘇聯很清楚看清這一點，一方面，以正義的立場，竭力援助中國，另一方面，加強遠東的邊防，堅持自衛政策。蘇聯毫無威脅日本或侵略日本的野心的。

然而日本軍閥爲着緩和日本與英美法之間的矛盾，遂行其外交上的陰謀（這主要是誘致遠東有關列強承認日本在華的特殊權利和幫助牠征服中國），也爲着試探蘇聯保護遠東國境的實力與決心，於是牠決定發動張鼓峰的戰爭。

這是一九三八年七八月間的事。當時歐洲的情勢因捷克問題，弄得非常緊張，而英美對日的態度也比較強硬，就在這時候，日本揀着一個最有利的地方，開始對蘇的挑釁。張鼓峰戰役的經過，這里用不着敘述。日本之受到嚴重打擊，乃是舉世共見的事。當時蘇聯除應用最新式的武器和集體的刺刀之外，又運用外交的壓力，李維諾夫曾對日本大

使嚴重表示，如果他不停止挑釁的行爲，那麼勢將受到更大的責罰，而且不僅限於張鼓峰一處。就在紅軍逐出侵略者和予以重大打擊之後，莫斯科接受了日本的聲請「停戰」的要求。

一九三九年六月，日本軍閥又在滿蒙邊境的諾蒙亨，發動了另一次挑釁。當時日本剛佔領海南島未久，英美法正因鼓浪嶼租界和上海地位的問題，對日施行壓力，歐洲方面，英法又在莫斯科舉行互助公約的談判。日本軍閥決定在這時候，顯示牠的反蘇決心。這次挑釁的地點，不在蘇境而在蒙邊，他們以爲蘇聯對蒙邊大概不會十分重視。跟上次一樣，他們又擇了一個於日軍最有利於蘇蒙軍最不利的戰略地點，並用了數倍於張鼓峰之役的部隊（前後約五師團），突然施行進攻。就戰事的規模和日期而論，諾蒙亨比張鼓峰來得大而長久，日軍所受的損害也一樣照比例的增加。結果，蘇蒙軍在三個月內消滅了日本整整兩個師團，俘虜了一萬員名，擊毀了五百八十九架日機，蘇蒙方面損失爲一〇六架。單八月末一次的大勝，日軍死傷和被俘虜的達二萬餘名，並奪獲了

百餘尊的大砲和數百架的輕重機關槍以及近萬枝的步槍。日軍顯然不能担負這『奢侈的浪費』於是牠又被迫請求『息戰』

當戰鬥結束的時候，日本各方的喜悅實在難以形容。九月二十一日的日本紀事報曾說：『日本各報對之自然同聲地加以熱烈的祝賀。』朝日新聞的社評是非常坦白的，他說：（註一）

「軍事當局公開承認他們已盡其所能這一點，國民應該加以信任。陸軍方面一向保守祕密的這一聲明，已消除了所有的疑慮。這解釋確有極大的好處。」

「同時，我們弔唁戰死者，牠的數目是出乎意料的大。最近的事變竟達如此的規模，竟致雙方損失的嚴重，無法於短時間內加以清算。由此可見我們的勇士的鮮血，已染過了該處的原野。」

「我們的軍事當局，已由這些事變中獲致他們的教訓。未來的軍事準備是應當充分的。」

（註一）見一九三九年十月二日的朝日新聞。

軍事當局已經周詳地考慮了這教訓。最主要的就是必須以最大限度的摩托化部隊供給陸軍。因為這是戰後近代戰爭的祕密。直到現在，國民們還不曉得蘇維埃摩托化部隊的配備是如何完善。今天有許多對這意外的發現正不禁爲之咋舌。

朝日新聞接着承認日方的損失爲一萬八千人（憑我們的經驗，日方的報告至少要打個很大的折扣，日本發言人承認滬戰三月的損失僅一萬人呢！）並以如下的警告作爲結論：

「我們應當好好注意由諾蒙亨區得到的教訓。我們應當準備，應當團結，用一切的可能手段，在精神和物質上，來完成我國的防務。我們已經非常迫切地感到此項需要了。」

諾蒙亨「事變」給日本的打擊和影響，連日關嚴厲控制下的輿論界，都已坦白承認了。日本軍閥至少已明白，不管是爲着外交上的理由，或是爲着日本侵略者的特殊需要，抑或僅由於對蘇的敵視，這些「事變」或「事件」的製造，只有引起災難與死亡。正如莫洛托夫一九三九年五月所說：「今日的蘇聯已不是以前的蘇聯」了。譬如牠已不

是一九三一年日本開始侵犯滿洲和蘇聯剛開始建設工作時候的蘇聯了。現在的蘇聯已不是五年十年以前的蘇聯，牠的力量已經增強了。日本軍閥在鐵拳的打擊之下，已多少認清了這個真理。自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起，到一九三九年三月止，據朝日新聞特派員渡邊的調查，蘇日之間的大規模邊境武裝衝突，共達四百三十一件，小規模的糾紛更難計數。（註二）然而在諾蒙亨事件結束之後，日本軍閥已開始節省這日本士兵的揮霍了。

蘇聯這些行動，跟我們上面所列舉的四項原則完全符合。張鼓峰和諾蒙亨的武裝衝突，既然由日軍掀起，蘇聯當然要給予「雙倍的打擊」，但蘇聯既然不想向日本挑戰，把國際反蘇的劍戟吸到自已身上來，牠當然不必拒絕日本的屈服。中國輿論界許多英雄們，曾嘲笑蘇聯爲什麼不乘勝進攻日本，反而答應與日談判劃定邊界的問題。這種

（註二）見一九三九年十月三十日的朝日新聞。這四百三十一件中，二百八十六件發生於東邊界，一百零八件在北邊界，以上均在滿蘇邊境，其餘三十七件乃在西滿滿蒙邊界。

「激將法」決不會動搖蘇聯的意志。即就中國的利益而論，如果蘇日發生戰爭，中國必然要被反蘇的列強出賣。中國的論客們難道相信日本在今日這樣的情形下，能夠對蘇對華兩面作戰嗎？難道日本軍閥在所謂中國事變沒有解決以前，敢和蘇聯發生正式的戰爭嗎？

日本之所以在蒙諾亨區進行冒險戰爭，其中有一個原因，就是獲得希特拉的合作，與希望英國支持軸心的反蘇戰爭。這光彩的「腓子泡」不唯在軍事戰場上為蘇軍擊碎，而且還在外交戰場上為蘇聯擊碎。這就是蘇德互不侵犯協定的簽訂。當這協定發表之後，日本簡直掉進絕望的深淵。她開始感到孤立無援，牠感到陷入中國泥沼的雙腳更難拔出。莫洛托夫的一筆，已把遠東的侵略者拋進國際的暗淡的角落里了。這協定甚至連天津的英僑，也獲得實際的利益，至少他已不再被日本哨兵脫下褲子檢查了。

隨着歐洲帝國主義戰爭的爆發，世界局勢最重要的特點，就是站在戰爭之外的蘇聯，已日益佔據着世界政治的中心地位，而且憑牠積極的機動，正在改變此種局勢。正如

我們上們所引列寧的話一樣：『我們不參加任何集團，我們是利用兩個帝國主義之間的敵對，使兩方面結果都落空：』顯然，英法帝國主義集團與德義帝國主義集團都因蘇德互不侵犯協定的成立而受了損失，不僅此，還有遠東的日本，也跟在德國屁股後頭而『落空』了。於是在遠東的外交舞台上，我們便看到兩個顯著的現象：其一，是日本已不再唱『日蘇是宿命的對立』等高調，相反，親蘇論更日見抬頭。其二，就是反蘇國家的對日妥協。

日本親蘇的論調，在白鳥敏夫（前駐義大使）等親軸心派的言論中，表現得十分露骨，他在本年五月號改造中曾說：

『據我的意見，日蘇之間並非具有一種非戰不可的命運……所謂「北進論」在政治上早已碰壁了。日本在北方，祇須獲得安全感便足够了。如果要在今後三十年五十年之內，於西伯利亞平原互爭雄長，實在是雙方都無謂。至於南方，則尚有擴張餘地。』

軍部機關報國民新聞與都新聞等，也都堅持聯蘇的主張，他們斥責日本當局的

「媚態外交」強調日本外交的方針，必須脫離親英美的傳統。正如日本外務省發言人須磨所說，共產主義是一件事，蘇聯又是一件事，國民新聞在去年十月十二日的社評中，也說「外交與思想問題，遇到目前的困難，在一國的存立上，已對世界指示新的意義了。這種事實，對於日本當局者之愚昧，混同自主獨立獨善而對世界舞台掩耳閉目，加以冷笑了。」在同報同年十一月三日的社評中，又說：「最近的蘇聯，是以打破國際現狀維持派的一種勢力而登場，並以對抗舊勢力的新勢力而出現的。這一點，正與日本的國際地位具有類似性。」他們認為要同時調整日本與美與蘇的國交決不可能，因為這是完全不相容的。國民在十一月八日的社評中，已明白指出：「日美兩國間國交的調整，與日蘇關係的改善，不能同時期待，不犧牲一方面決不能成功一方面。」

日本軍部和少壯派的企圖是聯絡蘇聯，加強日德日義的關係，利用歐洲大戰的有利條件，把英美法在遠東的利益完全排擠出去，並迅速結束對華的侵略戰爭。但是所謂日本的溫和派，却反對這一主張。他們並不反對聯蘇，不過程度上互不相同，僅把聯蘇作

爲調整日美關係的手段。英美帝國主義者當然是支持所謂「溫和派」的。爲着消極方面避免日蘇的接近，積極方面增強蘇日的衝突起見，他們就不能不付出相當的代價。美國之所以不願廢棄美日商約，反蘇列強在太平洋上的對日妥協，有一半的原因就在此。雖然歐戰的擴大和「民主國」的失利，也使他們不敢對日採取強硬的態度。美國金融資本家的代理人已高喊改善美日的關係了。國務副卿威爾斯六月初就表示美國願意與日本改善關係。主張廢止美日商約的范登堡（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現在也主張與日本重訂商約。遠在本年春間，這位范先生對朝日新聞華盛頓記者發表談話時，已說到：「日本如果與蘇聯締結了互不侵犯條約，我相信對日禁運就會馬上生效。」又說：「美國是可以承認『滿州國』的，假如日美對所有懸案能夠成立一個滿意的協定。」（註三）

美國遠東問題專家比遜，也曾揭露太平洋上的反蘇陰謀。（註四）

（註三）以上所引兩節，俱見上海之時代半月刊，前刊號。

（註四）見一九四〇年一月號之Asia。

「……英國的有力份子，常視日本爲東方的反蘇的重鎮。就現實的觀點看，倫敦正想製造一個遠東的慕尼黑會議，讓日本在中國佔有一些掠奪物，使牠在東方進攻蘇聯。這種計劃自然要與美國合作。在他們看來，美國在歐洲事件上面，既已傾向英法，而美國的反蘇傾向最近也正加濃，所以在遠東政策上也許可以同樣合作。」

在這種情形下，日本自然願意以親蘇聯的姿勢，來敲詐這些帶白手套，既欲反蘇反共而又不願意用自己的手打仗的人們。本年三月十日，日本外務省發言人須磨，在東京新聞記者情報會議席上，曾宣佈日本即將與蘇聯改善邦交，但他立刻接着說：「日本也願與美國加強友誼，取得合作。我們盼望美國立刻發動重訂商約的新談判。」（註五）日本之有意以聯蘇威脅美國，已在須磨這談話中充分表暴了出來。

在這裡，必須考慮的是日本聯蘇的可能性的問題。國內有一部份人認爲日本的革新派是以聯蘇爲目的，溫和派則以聯蘇爲手段，這種說法似乎把日蘇接近的可能性過份誇大。日本的革新派必然曉得，蘇聯不是美國，她雖有豐饒的富源，但牠決不能跟美國

一樣，把大量的軍需原料供給日本。侵華三年來的事實，已證明日本對美的倚賴性是如何巨大了。

縱使蘇聯願與日本接近，日本也不能撇開美國，否則牠的戰爭機構就要受到嚴重的損害，或甚至於完全停滯。這是一。其次，要蘇聯加入德義日集團，以『打破國際現狀』，從而使蘇聯放棄援華的政策，這顯然是個夢想。日本政治家儘可以高唱聯蘇論，但蘇日之間的缺乏共通性，蘇日間若干致命矛盾之難以解決，這些都是日本聯蘇論者絕對無法否認的。蘇聯的外交政策是自主而獨立的，牠雖然願與日本保持善鄰的關係，但牠決不因日本的『媚態』而改變，更不會與牠妥協而採取不利於中國的行動。本年四月二十一日，上海各報曾登載這樣的消息：

「此間（指莫斯科）——引者——發出特殊廣播，否認日方所稱蘇聯亟欲在歐洲行動自由，不受牽制，故願以任何代價，與日本謀取妥協之說。廣播斥責此說為荒謬，謂因遠東局勢而

（註五）見本年三月十日上海英文大陸報。

亟欲對蘇聯謀說妥協者，厥爲日本，此層雖日本也必知之。」

這廣播的內容充分表明蘇聯獨立的態度。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中，蘇聯的地位已日見重要和增高。日本當局顯然已認清了這一點，所以牠才一變反共反蘇而爲聯蘇企圖挾蘇聯以自重，並借此來敲詐美國。但這是蘇聯的勝利，而不是日本的勝利。日蘇關係是否能夠調整，兩方能否到了相「聯」的地步，都不能由日本單方決定，日本雖然會打如意算盤，但牠不能決定蘇聯的政策。現在的遠東已不是以前的遠東，現在的蘇聯更不是以前的蘇聯，蘇聯在遠東的地位，已比日本重要得多了。從日蘇兩國的關係而言，日本是被動的，蘇聯是主動的，日本是守勢的，但蘇聯則隨時有採取攻攻的可能。無論從政治上，軍事上以及經濟上都是如此。假如日本三年前不發動侵華戰爭，那麼牠在遠東的地位，或許不會像現在這樣悲慘。

首先從政治上說，蘇聯無所求於日本；也無忌於日本。但日本却有求於蘇聯，而且害怕蘇聯。蘇聯在不侵犯協定的成立和國際反蘇國家的內閣，使日本的法寶已毫不值錢，

中國的堅持抗戰，也使日本的實力與地位大為削弱。當本年正月日本駐瑞典大使松島路過莫斯科，協助駐蘇的東鄉大使與米高揚進行商務協定的談話時，日本各報都表示熱烈的歡迎。但松島經三個月的斡旋，仍然毫無結果，日本國內對此的反響，可以由大陸報如下的社評中看出來：（註六）

『從日本廣知報（Japan Advertiser）上所載的，日本「權威方面」對此舉的批評，多少可以看出，日本官方當局，對談判的破裂業已大感失望。據說，蘇維埃政府最近對調整日蘇邦交的態度，異常冷淡。照日本官方的話看來，蘇聯代表團在互三個月的談判中，其態度始終頑強，只尋求細小的直接的利益，而對日方的「最誠懇的願望」，則毫無誠意。因此「權威方面」表示，如果俄國繼續採取這種態度，他們勢將失去意義重大的收穫，並須預防日方「具有嚴重性質的反攻。」』

這就說明日本國內有力份子之提倡聯蘇論，雖然已經半年，而結果還只能在口頭

（註六）見本年四月二十三日上海英文大陸報，題為莫斯科態度冷淡。

上唱唱的原因。蘇聯對日的態度是積極的，主動的，假如中國不放棄抗戰的國策，假如國際反蘇勢力沒有新的陰謀，假如日本的政制不會發生嚴重的或根本的變化，那麼蘇聯對日的態度是決不會改變的。

從軍事上說，日蘇的關係也是如此。日本已失去主動的和攻勢的地位。三年的侵華戰爭，已使牠的實力大為削弱，而第二次五年計劃的完成和第三次五年計劃的順利進行，反使蘇聯的實力日見增強。日本實際上已無力反蘇，而蘇聯則隨時都有向日本進擊的可能。

德國著名軍事專家馬克思·威格納在其名著列強軍力論中，曾於詳細的分析後，得到如下的結論（註七）

「……日本不斷的威脅，已激勵蘇聯成爲一個強大的軍事國家，驅策地在建設上作巨大的努力，並加速其完成。而對這些威脅的特殊回答，是蘇聯遠東的驚人的發展，牠已成爲

（註七）見生活書店列強軍力論中譯本四二四頁。

世界最堅強的軍陣地之一，而且是一個強大的亞州的勢力，擁有雄視全亞的陸軍和空軍。

蘇聯遠東紅軍是一個獨立而強大的力量，牠的火力，配備，訓練都與時俱增，即使蘇聯在西方作戰，牠還是一樣能夠單獨對抗日本並擊潰日本。因為蘇聯遠東的與西歐的軍事組織是完全獨立的。就軍力而論，遠東紅旗軍的常備兵，至少在五十萬人以上，在西伯利亞，外貝加爾，中亞細亞和烏拉爾四個軍區里，還有十四個步兵師團和四個騎兵師團，而後備軍的實力更加雄厚。遠東紅軍的戰時實力，至少在四十師團至五十四團之間。此外，牠的防禦陣地的堅強，軍備的優越，特別是牠的進攻武器（飛機，坦克，重砲等）的達勝於日本，和戰略地位的有利，更使牠佔居絕對的優勢地位。

一九三八年蘇聯在遠東第一線的飛機至少為三千架，而日本在侵華之前至多只有一千至二千架（蘇聯重轟炸機佔全數二分之一，日本各式轟炸機只佔四分之一）蘇聯遠東輕重坦克至少為三千輛，而日本全國至多只有一千輛。日軍機械化與摩托化

之不及紅軍，上引朝日新聞社評已有坦白的承認。但這裡所舉的數字，都是侵華以前的，目前日軍實力當然更加薄弱，而紅軍方面，則因年來的積極改良和補充，勢力較前引數字當然更爲雄厚。何況蘇聯的戰略地位也比日軍爲佳，交通運輸線也有空前的發展。蘇聯在遠東所佔的絕對優勢，是日軍永遠無法超越的。所以我們可以毫不躊躇地說：蘇聯無懼於日本，但日本則有懼於蘇聯。這軍力的對比，決定了雙方在遠東的地位。

第三，從經濟上說，日蘇的關係也是如此。就純貿易而言，蘇日貿易並不重要。據本年一月美國商務部國內外商務局局長楊格的報告，日本輸蘇貨物，通常每年僅值美金四百萬元，一九三五年到三七年，因爲日本購買中東鐵路，其中二千八百萬美元，用日本貨物支付，所以輸出比較增加，但到了一九三七年貨款付清後，一九三八年日貨輸蘇貨物就減至一百四十七萬六千美元，而一九三九年一月至九月，則跌至七萬一千美元。總之，日本每年輸往蘇聯的貨值，僅及輸往美國貨值的一百五十分之一。

蘇聯輸往日本的貨物與原料，也是極少的。一九三七年爲三百八十九萬九千美元，

一九三八年跌已二十一萬五千元，而一九三九年一月至九月，則僅有七萬一千元，與同時期美國輸日貨值比起來，只及三千分之一。本來蘇聯輸日貨物，還比較多，直到一九三七年日本侵華之後，就迅速降落。但總計近十年來，蘇聯對日貿易總額，還是出超的，約值二一、五〇〇、〇〇〇美元。如果把中東路貸款二千八百萬元拋開，則達四九、五〇〇、〇〇〇美元之巨。由這一點，也可以看出日本對蘇的倚賴。日本需要而蘇聯又可以輸出的原料，本來很多，如汽油，重油，煤，鐵，木材，礦砂，白金等，但蘇聯不願意跟美國一樣幫助日本的侵略，他寧可在歐洲另找市場。而日本可以輸出的貨物，如絲，茶（蘇聯現在完全購買中國茶葉），棉織品等，蘇聯又完全不要，蘇聯所要的（如機器與橡皮），日本又無法供給。因此日蘇間簡直沒有貿易。

然而除此之外，還有其他更重要的問題值得我們注意，這就是北庫頁島煤油讓與權與漁業的問題。日本自戰勝帝俄，從樸希茅斯和約上獲得這兩項利權之後，庫頁島的油與蘇聯領海的漁業，在日本的經濟生活中，一向佔了很重要的位置，前者是日本自身

所能生產的油的唯一來源，而後者則關係日本人民的生活。但自日蘇關係發生變化之後，蘇聯便在經濟上與日本競爭，在政治上則對日本施用壓力，因此日本所受的打擊是異常嚴重的。關於這兩個問題，上海經濟專家安煦勒去半曾在密勒氏評論報上作過如下的說明：

「過去九年間，日本在蘇聯境內的油區和漁場，曾引起莫斯科與東京間無限嚴重的糾葛。日本海軍爲自己的利益着想，曾把北庫頁島的油區，視作一種特殊的油庫。對於日本會社開採的困難，大爲不滿。日本各種擴充舉動，着着失敗，還把會社的怠工，也歸咎於蘇聯。而在蘇聯方面，也指摘日法不履行對於油區的條件，尤其是日本妨害蘇聯的勞工立法。蘇聯已使在北庫頁島採油的日人，在工作上和生活上，都感到困難，只好把出產停止。」

「至於漁業問題，過去幾年，蘇日一到每年春天，就要發生糾紛，而每次都用臨時的協定，把牠延宕下去。但這種糾紛，一年比一年尖銳化。去年夏天，遠東方面還擔心牠會釀成戰事，不過，蘇聯仍然把牠放過了。可是明年蘇聯還肯把牠放過嗎？……」

在這兩個問題上，老實說，蘇聯始終站在優勢的地位，牠要在什麼時候剝奪日人的採油權與捕魚權，就可以在什麼時候加以剝奪。憑蘇聯目下的地位，日本是決計奈何不得的。因此從經濟上面講，日本依然居於被動的和劣勢的地位。

由上述三點的說明，我們已可以看出日本是居於怎樣不利的地位，而且就現在的情勢而論，日本的這種劣勢，只有一天的加甚，而蘇聯的優勢，却只有一天的提高。這種變化，對雙方的外交政策有什麼影響，我想簡直是用不着說明的。

然則日本的劣勢地位，會不會減輕日蘇之間的敵對呢？回答是絕對否定的。兩個體系間的矛盾，無論如何不能消除，即使他暫時間稍為緩和，兩方的基本矛盾還是依然存在。蘇聯雖然居於優勢，牠決不濫用這一優勢。我們相信，在適當的時機到來的一天，日本必將受到牠立國以來所未遇到的致命打擊，終至從人類歷史上抹去了日本帝國這名字。

三 蘇聯三年來的對華政策

蘇聯的對華政策，跟一切的帝國主義國家的對華政策有着基本上的差異。蘇聯對中國的援助，完全基於進步的、革命的、援助弱小民族獲得徹底解放的立場，絲毫沒有自私自利的成份。同時地理上的偶然，又使中國能夠比民主的西班牙，獲得更多的援助，從而使抗戰獲得了更切實的保障。請想想，如果中國北面仍是帝俄，現在該是什麼光景？

要了解蘇聯對華的政策，我們必須認清蘇聯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由於年來國內建設的猛進和國力的增強，牠已到了由社會主義轉入共產主義的階段。在經濟上說，牠是能夠自給自足的，牠有着無限的蘊藏，牠擁有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現在牠最注意的，就是憑藉自力以完成這種經濟上的發展。在這樣的社會、經濟組織之下，牠絕對不需要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也絕對不需要輸出資本的市場，抑或倚賴外界的經濟的支助。因此牠在中國抗戰過程中所採取的援華政策，與爲着對抗日本獨佔中國市場，從而給

于中國抗戰以有限的援助的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策，就有着基本的差異。蘇聯援助的目的，是幫助中國擊退日本的侵略，完成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和擺脫資本主義世界加於中國的半殖民地的羈絆。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的援助是自私自利的，只要日本和他們之間獲得妥協，他們隨時可以撤消對華的有限援助，而易為對日的援助，但蘇聯却始終以中國的民族抗戰為前提，而且相信基於民族統一戰線的中華民族的抗戰，是有着光榮而偉大的前程的。莫洛托夫去年十月三十一日在蘇維埃最高會議的報告中，曾扼要而明晰地說明了蘇聯對華的態度，他說：

「我們對中國的態度，是無須我來說明的。諸位對斯大林同志關於幫助那些被侵略者所侵略和為他們自己的祖國的獨立而鬥爭的國家的聲明，當然知道得很清楚。這聲明對於中國及其為民族獨立而作的鬥爭，完全可以適用。在實際上，我們是堅決地執行這個政策的。」

蘇聯之所以採取此一政策，又可以從牠立國的原則上去找到說明。蘇聯是現世界

唯一的建築在社會主義精神上的國家。十月革命推翻了地主和資產階級的政權，建立了工農蘇維埃，這政權在本質上就是反戰爭的，反侵略的，反掠奪與反剝削的。在牠剛一建立的時候，牠對內就宣佈被壓迫民族有民族的自決權，承認他們的獨立自主的權利，對外則宣佈援助弱小民族的解放戰爭，決心使他們從帝國主義的重壓下獲得解放。因為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是共產主義，牠的最後任務就是解放全人類，使他們獲得平等幸福與自由。因此，牠就不能不有國際主義的精神，不能不參加一切足以產生社會主義革命和打擊帝國主義的各種運動。蘇聯是贊助弱小民族的解放戰爭的，一方面是因為這門爭是正義的，進步的，反侵略的門爭；另一方面則因為牠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另一戰線上的戰鬥，是國際反帝門爭的一個主要環節。離開了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被壓迫民族的反帝門爭，就談不到世界革命。由此，我們不唯可以看出蘇聯真誠援助中國的原因，而且說明了中國必須採取積極的聯蘇政策的理由。中國的民族革命抗戰，根本就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中國如要勝利地擊退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壓迫，就必須與蘇聯親密

攜手。在二十世紀的今日，中國的抗戰沒有蘇聯的援助，是不能獲得澈底的勝利的。

三年以來，蘇聯的援華政策是積極的一貫的，牠利用每一種手段，每一個機會以援助中國。牠的援華政策，跟牠整個的外交政策，即防護國境，保衛和平，反對侵略，推進集體安全等，有着密切而有機的聯繫。牠是沿着如下三條路線進行的：

第一：在此次歐戰爆發之前，蘇聯即利用各種國際性的組織以加強各國對華的援助。牠推動所有各個有意或因利害關係而願意維持和平和阻止日本侵略的國家，對中國作集體的或單獨的援助。爲着達到此一目的，出席國聯歷屆會議和九國公約會議的蘇聯代表，除竭力支持中國代表的呼籲之外，又建議草擬實際條文，動員各員國援助中國，以打消英法等國的「不干涉政策」。蘇聯代表在這些會議上所表現的堅決援華態度，比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都積極，這是舉世共知的事實。

第二：基於貿易、交換或貸款的協定，給中國以物資的和技術的援助。爲着適應中國

迫切的需要，蘇聯當局又改善中亞細亞通至新疆的貿易運輸路線，以與中國的西蘭公路相連接。中蘇新商約在一九三九年六月，即二次歐戰以前擬定，一九四〇年一月，即日本商業代表團到達莫斯科時，由蘇維埃最高會議批准，單從這一點，正可以看出蘇聯的援華政策，並不因國際形勢的劇變而起變化。蘇聯這種態度，跟所有的「民主」國家，在歐戰爆發後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妥協態度比較起來，特別來得堅強而凸出。中蘇兩國間的貿易關係，是逐年增加的。據本年三月三十日重慶新華日報所載，中國輸往蘇聯的貨物，以香港為主要中心，再由此經海道運往海參崴與敖得薩。其中以茶葉、桐油、豬鬃及錫砂為大宗。一九三七年中國運蘇貨物總額為港幣六百萬，一九三八年為港幣一千五百萬，一九三九年為港幣三千萬，較一九三七年超過五倍。蘇聯根據貿易協定輸往中國的，主要由西蘭公路輸至華中，其中大多為飛機、汽油、坦克、機槍、重砲、汽車及機器等，其價值因中國政府未曾宣佈，不知其詳，但據估計至少在華幣四十萬萬元左右。正如新中華報社論上所說：（註八）

「關於蘇聯對中國抗戰物質的援助，只要沒有失去天良的人，是都不會否認的。無論在軍械、飛機、大砲、坦克、在人材、航空員、軍事顧問等方面，蘇聯均對我國抗戰，給予了莫大的援助。單在財政方面，就曾給了我國以四十萬萬元以上的鉅款。除去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而外，又有那一個國家這樣幫助了我們呢？」

憑中共在國內的威信，與其言論的慎重看來，我們相信新中華所舉這一數字，（指四十萬萬元的貸款），是有充分的真實性的。用不着諱言，中國目下所有的飛機、坦克、巨砲都是蘇聯供給的（美國給中國的貸款四千五百萬美元，只能購買一百五十架轟炸機，何況又因中立法的原因，中國只能讓這款項購置汽車等用具而已。英國的貸款，除中英匯兌平準基金而外，只有五百萬鎊，而且還沒有全數撥付）。關於此類事實，孫科和郭泰祺等的談話，都可以用作證明。

（註八）見上海出版界第四九期內地通訊（鉛印本）中所轉載的延安共產黨機關報新中華報社論，題為黨和約對中國抗戰的意義。

去年十一月十日，倫敦金融時報曾登出消息，說「據可靠方面傳出消息，中蘇兩國已於數日前成立協定，由蘇聯以美金六千萬鎊貸與中國，以供購置戰品之用，中政府則允以中國出產的錫、鎳、鎳、三項礦砂留出大部份，以應付蘇聯之需要。」當倫敦路透社記者以這問題詢問孫科時，孫氏表示「蘇聯對華不時供給信用貸款與戰品，但『未便說明其數量。』」（註九）在同年十一月十一日，他又對新聞紀事報訪員發表如下談話：（註十）

「……我國前於本年六月間在莫斯科與蘇聯政府所簽訂的商務協定，業已赴之實施。蘇聯當以軍火與機器供給我國，吾人則以茶葉及各項重要產品如錫、鎳之類，供給蘇聯。總之，該國所給予我人之援助與軍械，實較其他各國為多。」

本年四月二十五日，郭泰祺大使又發表如下發明（註十一）

（註九）見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申報。

（註十）見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上海申報。

（註十一）見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上海大美晚報。

「中國自蘇聯方面獲致之物質援助較之自他國方面合併所得者甚多。中蘇關係極爲友善，中國無條件自蘇聯方面獲得援助。余以爲蘇聯感覺吾人爲中蘇兩國抗戰，是以不吝援助。」

由以上兩要人的談話，我們便可以看出蘇聯援華的程度。雖然正確的數量到現在依然是個未知數，但下面的消息是極值得注意的。

「中國經新修以達蘇聯之國道，近已愈見暢通，因此蘇聯軍火之運華，益爲便利。在成都市內，每日均到有卡車三百輛，滿載軍用品。」（註十二）

外國記者的觀察和報告也是值得參考的。英國名記者阿特麗在本年二月號亞細亞上，曾說：「中國除蘇聯之外，得不到什麼軍火的援助。」美國記者斯諾在本年四月號外交季刊上，也曾這樣說：

「在離西藏不遠的成都，有蘇聯人在幫助中國建立空軍根據地。去年十月我訪問該地

（註十二）見一七三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中美日報。

的時候，有一百五十名左右的蘇聯人住在那里。據當地的中國人報告，該地備有供六百人居住的大宿舍，在西北的蘭州，有五十架俄國的練習機，（驅逐機和轟炸機），還有五十架馬上就可以運來。蘇聯準備在西北代中國維持一隊由二百五十架各種型式的飛機組成的空軍。

「陸軍方面，蘇聯也遣派了不少教官，顧問和技師至中國內地……各戰線上差不多都有蘇聯的顧問，大部份都是在蘇聯紅軍中受過訓練的將校。」

「最近連重慶反共派的副首領張羣，對蘇聯的軍事借款（約七萬萬五千萬盧布）也說是「條件極大極適切。」據說莫斯科同意將中國法幣照戰前市價計算，這一點很幫助了中國的通貨問題。最後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對華借款的最後決定，在德蘇協定前夕的八月，底還沒有談妥。」

美國前駐華武官卡爾遜在去年十月號美亞雜誌上也曾說到：「蘇聯援華的程度，必然要由中國國內行政的性質而受到某種程度的影響。蘇聯政權的社會主義特質，使得牠的政府是不能專在牟利上着想的。」卡爾遜這一觀察，很可以補尼諾文中的敘

述。

第三：蘇聯遠東紅軍的強大的軍力，周詳的準備，以及衛國的決心，使日軍不得不畏懼蘇聯的實力和尊重蘇聯的領土。日軍在張鼓峰與諾蒙亨的屈服，已把牠的「反共」計劃完全粉碎。日本藉反共之名以引誘國際反動勢力共同出賣中國的陰謀，也已揭穿無遺。這對於中國的抗戰與外交，有着非常重大的貢獻。但更重要的是蘇聯領土的不可侵犯，保證了中蘇的友誼和蘇聯對華的援助。中蘇領土的相接，和蘇聯始終不顧日本的挑釁威脅，繼續援助中國，使國際的反動勢力，無法加以封鎖。（最近英法兩國已與日本帝國主義者合作，在實際上，完全封鎖滇緬滇越兩路的交通了。）中國決非西班牙，地理上的偶然，使蘇聯對華的援助可以繼續不斷。

此外，蘇聯又是遠東有關各國的妥協政策的最積極的批評者。牠暴露了綏靖日本與賄賂日本的屈服政策的內容，揭穿了「中立政策」與「不干涉政策」的實際陰謀，並指出這些政策與陰謀的結果，將是「舉起石頭擲自己的脚」。斯大林在蘇聯共產黨

第十八次大會的報告中，就曾指出這一點。他說：「不干涉政策的推行者所發起大規模的政治遊戲，是危險的，結果將成爲他們的悲慘的失敗。」這種猛烈的批評，對於有關各國是一種警告，對有關各國的民衆，則是一種喚醒和教育，指示他們應積極援助被侵略的國家，特別是中國的抗戰，因爲從他們本身的利益上說，也應該如此。此外，蘇聯又熱烈地鼓勵中國，指出澈底的抗戰，定能引導中國走上勝利的解放的坦途。這現象，在世界任何其他的國家的新聞界上，完全沒有見過。蘇聯對中國抗戰的關心，非常純潔而真摯，這決不是偶然的事情，只有社會主義的國度才能如此。我相信中國的人民大衆都知道，世上除中國之外，再沒有一個國家對中國的抗戰比蘇聯更爲關心。鄧穎超女士從蘇聯回來之後，曾在重慶作了如下的報告（註十三）

「莫斯科乃至其他各地的報紙都專闢一欄，報導中國抗戰的消息，如湘北大捷，桂南勝利的消息，第二天就以大號的字在蘇聯各地報紙上出現。「三八」國際婦女節的時候，蘇聯

（註十三）見一九四〇年六月一日上海婦女重慶通訊。

各地的紀念特刊，都有中國婦女的一欄，他們注意着中國婦女的生活，尤其關心着中國婦女在抗戰中所做的工作和許多轟轟烈烈的英勇事蹟。

「蘇聯人民對於中國抗戰都抱着必勝的信念，但他們一致認為：只有全國精誠團結一致對外，才是戰爭勝利的唯一保障。」

在這里，我想有把美國（被公認為帝國主義國家中最同情中國者）的實在情形，作個比較的必要。（註十四）

「一位最近在美國作了六個月的旅行的美國商人，曾對記者說：美國對中國問題的注意，竟然這麼冷淡，甚至在美國報紙上，簡直看不見關於遠東問題的文章。這情形在太平洋沿岸的尤甚。他說他在舊金山住了一個月，在這時期內，他發覺該城所有報紙，完全沒有登載遠東方面的和中日戰爭的消息。

「大西洋沿岸的情形，據他說，雖然很壞，還沒有前者那樣糟糕。」事實就是這樣的，歐戰

（註十四）見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九日上海英文大陸報。

已把遠東戰爭完全掩蓋了。美國的大商人最關心的是賣軍火給協約國，太平洋沿岸方面對這種貿易的關心，跟大西洋沿岸方面是完全一樣的。事實上，由舊金山，洛杉磯和西雅圖等處經由巴拿馬運河運往協約國的軍火，比東岸方面還要多。」

所謂「正義」與「反侵略」在資本主義王國中是毫無地位的，他們所注意的，乃是利潤。這就是美國之所以繼續供給日本軍火的原因。老實說，他們對遠東中日戰爭的冷淡，並沒有出我人意料之外，可怕的是我們的親美的宣傳，在這種情形下，還竭力在國內民衆之間，培養倚賴美國的有毒心理。

無論如何，蘇聯對中國的援助和同情，乃是無可懷疑的事實。不唯這種真正的援助，比所有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援助」的總和要多好些倍，而且本質上，牠完全不是爲着牟利，而是爲着幫助華民族的獲得解放，所以這種幫助更是特別可以寶貴的。

四 中國對蘇政策的批評

樣的：

當孫中山先生臨終的時候，他曾經致函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這封信的全文是這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中央執行委員會親愛諸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時轉向你們，轉向於我國黨及我國的將來。

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的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的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人，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為基礎之國際制度下謀解放。

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與被壓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成真正同志之人。

故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的羸弱，為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

府也必繼續前次予我國之援助。

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意表示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與盟的資格國而歡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的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

謹以兄弟之誼祝你們平安！

（孫逸仙）簽字！

中山先生這封遺書，是中國非常重要的歷史文件。中國對蘇聯所應取的態度，在這里已有了非常明晰而確定的指明——蘇聯乃是中國的良友與盟國，在進行民族革命工作，擺脫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羈縛中，必須與蘇聯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顯然中山先生已洞見中國的民族革命乃是今後世界革命的一部份，與蘇聯所負的歷史任務密切符合。假如從當時起，中國能恪守中山先生這一政策及其他的二大政策，中國早已進入勝利自強之境，而勿須於今日喪失半壁山河，從事艱苦的抗戰了。

但正如衆所周知，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聯盟政權，自一九二七年之後，即背叛了

中山先生的遺教，盲航於帝國主義的絕路中。由於背棄和鎮壓中國革命人民大眾的結果，中國反動政權完全倚賴帝國主義勢力的支撐，從而使牠成爲執行帝國主義利益的代理機關。中蘇間的關係至此完全逆轉了，兩國自一九二七年之後，即完全斷絕外交關係。當時政治上的反共防共的口號，與今日大漢奸汪精衛所揭棄的毫無兩致。這是中華民族的巨大損失，是帝國主義勢力與封建勢力的絕大勝利。

抗戰爆發之後，情勢突變了。由於對外政策的部份改變，中國與蘇聯也恢復了外交的關係。兩國外交最初的成就，是中蘇互不侵犯協定的簽訂。但實際上，中國抗戰後的對外政策，在武漢陷落以前，主要的爭取對象是英美，後來則完全倚賴美國。這就是說，中國的外交政策始終沒有擺脫親帝的路線。但由於人民大眾政治覺悟的空前提高，與各帝國主義對日妥協的層出不窮，揭穿了他們的「援華」真面目之後，又使一部份上層份子也對親帝政策感到幻滅，因此聯蘇論在國內大大抬頭了。直到今日，對蘇態度已成爲對抗戰態度的指針。堅持抗戰到底的人，都竭力主張與蘇聯建立更密切更友好的關係。

決不疑忌更不誣蔑蘇聯，而是信賴蘇聯。另一方面，抗戰陣營里那些策動反蘇，利用一切機會（如蘇聯進兵波蘭，日蘇停戰協定，蘇芬戰爭等）來誣蔑蘇聯和散佈疑忌蘇聯論調的人，他們決不是出於單純的無知，而是由於抗戰的不堅決，由於他們對親帝路線（特別是華盛頓路線）過份熱中所使然。這些反蘇份子，也正是反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製造國共磨擦的「好漢」，他們一向就靠着帝國主義的援助，以鞏固和維持他們的權勢。他們的抗日，爲的不是民族的澈底解放，而是因爲日本要剝奪他們向來的半殖民地，的「買辦」的身份。他們唯一的希望是聯合歐美的帝國主義，來壓迫日本帝國主義，以「民主」的帝國主義的對華統治來代替日本對華統治，以半殖民地狀態的保存來代替完全殖民地化，也就是說，他們不願當日本的一國的臣僕，而願意有一十幾個的主人。」

此所以他們那樣歌誦九國公約，此所以他們那樣歌誦歐洲的帝國主義戰爭爲「反侵略」的「正義」戰爭，此所以他們要以假憲政來代替真憲政，以包辦抗日來代替全民的抗日革命戰爭，以強迫捕捉壯丁來代替人民動員，以「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黨」

來代替民族統一戰線和真正的民主政治。在這種情形下，他們之以親帝路線代替聯蘇路線，以「爭取外援」來代替自力更生，以他們自階級自政權的利益來代替全民族的利益，藉以保證其奴隸總管的地位，這些反動份子業已組成一個反蘇的聯合戰線了。

但他們也曉得只有蘇聯的援助，才能使他們支持這個包辦式的戰爭，否則他們就無從與日本討價還價，更無從使帝國主義國家付出更大的價錢。他們以聯蘇的姿勢，來諷勸他們的主人——在某一點上，這手法跟日本軍閥所應用的完全一樣——並對他們說：「如果你們不援助我們，我們只好投到莫斯科的懷里去了。」這就是中國親帝派對聯蘇政策的態度。

但既然獲得了蘇聯的幫助，要怎樣對民衆交代呢？於是反蘇份子想出了一個辦法：他們說蘇聯的援助中國是私自自利的，因為蘇聯害怕日本。這跟他們之歌誦美國，恰成一個尖銳的對照，在他們的筆下，美國完全是出於「道義」和「維持正義扶助弱小」而援助中國的。這種論調是這樣普遍，連駐英大使郭泰祺在說明蘇聯對華援助較其他

各民主國的總和如多之後，他也接着說：「余以爲蘇聯感覺吾人爲中蘇兩國而戰，是以不吝援助。」

在上海的「輿論界」上，這種反蘇態度有着清楚的反映。

「按之蘇聯之基本國策，漁利在所不辭，苦戰非僅樂爲。」——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九日
申報的社評

「蘇聯之政策，以蘇聯國家爲本位，爲蘇聯國家之「權利」與「安全」計，其政策乃得超越國界而伸其「義務」與「門戶」以及「軍事根據地」於他國國界之內。此種政策，實與所謂是非也者，風馬牛不相及也。……由莫洛托夫之言，可以深信蘇聯在過去七旬間實以和平爲本，雖在波蘭境內，在「波蘭瓦解」後，「與波軍發生大戰」，和平政策下之蘇聯紅軍也死傷二千六百人，然以略地十九萬六千方公哩之廣，人口一千三百萬之衆，則彼二千六百人所流者，也可謂「和平之血」矣。……」——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日申報的社評

「蘇聯戰事發生後，中國政府當然沒有說明立場的必要，但中國人民却都表示着無限

的關切。因爲如果蘇聯在芬蘭問題上已確實表示是一個無限度的侵略者，那麼牠是否會「狐狸狡猾」，回過頭來拆中國抗戰的台？或者蘇聯既有事於西方，是否會爲了牠本身的利益關係起見，竟與東方的侵略者取得妥協？這兩點可說是每個中國人在蘇芬戰爭發生後共有的疑問。」——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日申報的社評

因爲中國現在還須蘇聯的援助，因此「輿論界」對蘇聯還不敢公然斥責。他們以曲達的方法來表示他們對芬蘭的同情，下面三段，就是最好的證明：

「……芬蘭所處的地位不幸，又與蘇聯西陲門戶有關，兩國遂難免發生戰爭。蘇聯當局之重視其西陲門戶與昔日帝俄時代執政者是沒有程度之高低。這是俄國立國以來的政策。自彼得大帝建都西陲後，歷來的俄國當局未有不對此問題悉力以赴的。今蘇聯既已自芬蘭獲得門戶安全的保障，自然不再以侵略爲能事，于預芬蘭內政，或用希特勒對捷克之方法的辦法，將芬蘭滅亡。」——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五日中美日報社評

「夫世變之嚴重性，在一九三一年而既然，及至最近而始使愚笨麻木之人類各有所感

應，各有所領悟。豈蘇聯視日本爲醜，豈芬蘭視中國爲大徒以世人不料日本而後，又有德國不
料德國而後，復有蘇聯，遂使人人感覺禍患之由少而多，由遠而近，橫禍之將及己身。」——
九三九年十二月四日申報社評

中美日報把蘇聯比之殘酷好戰和掠奪弱小的帝俄，而申報則把蘇聯與日本和德
國並列，請問還有比這更確定蘇聯的侵略者的身份嗎？老實說，重慶方面以及內地的輿
論界也抱着類似的態度。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路透社重慶電訊，重慶官場雖然對蘇
芬事件，不願加以批評，但因「中國本身遭受侵略，對於自由與獨立而奮鬥的芬蘭，自
表深切的同情，惟以目下蘇聯援助中國抗戰的關係，致對此種同情，不能作公開的表示。
〔見十二月三日申報〕」然而他們終在上海華文報中，找到表示此種「正義的高貴的
同情」的機會了。

老實說，中國一部上層份子所抱的這種反蘇態度，在日本和其他的帝國主義國家
看來，恰是「正中下懷」的。他們最怕是中蘇兩個偉大民族的密切合作，使一九二五！

一七二七年那種轟轟烈烈的民族革命運動，再度抬頭。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他們深知中蘇的合作，必然推翻了他們併吞中國的計劃。於是他竭力製造各種蘇聯侵略行爲的謠言，一方面以離間中蘇的友誼，一方面以強迫在華有重大利益的帝國主義列強，共同壓迫中國脫離蘇聯，而與日本講和。因此，中國這些反蘇份子的態度與論調，已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成爲侵略者及汪精衛的應聲虫。這是完全違反抗戰的利益和中國人民的利益的。

然而中國的人民大眾和革命的黨派，却始終尊重和奉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遺教。他們決不疑忌和誣蔑蘇聯，相反，他們是尊重而且信賴蘇聯。三年來，人民大眾的觀蘇情緒日見增高，而三年來的事實，正證實中國民衆這種親蘇態度是正確的。蘇聯現在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切的國際問題，離開了蘇聯就不能解決，一切的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沒有蘇聯的援助，就沒有獲得最後勝利的可能。中國人民爲着自民族的澈底解放和人類與世界的未來，應該打擊粉碎一切的反蘇陰謀與論調，加強中蘇兩大

民族的友誼與合作中國的人民大衆應該自動與蘇聯親密地攜起手來！

三年來英美蘇遠東政策的透視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著	者	蕭	揚
出	版	者	遠東書店
發	行	者	遠東書店
經	售	各	大書店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初版

★實價每冊國幣八角★

